

中國遠征軍 第一次入緬作戰

80週年座談會 論文集



遠征

目錄

開幕致詞

- 紀念仁安羌戰役 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 1
 - | 中華民國第十二、十三任總統、馬英九基金會董事長 馬英九
- 八十年前的今天 10
 - | 中國遠征軍仁安羌大捷第 113 團團長劉放吾之子
 - | 美國聖母大學劉氏亞洲研究學院捐贈創辦人 劉偉民

圓桌論壇

- 遠征軍的研究必須繼續 23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周惠民
- 歷史爭論的解答 28
 - | 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 張鑄勳
- 徵集遠征軍史料的重要性 35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劉維開
- 圓桌論壇逐字記錄 39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人文中心主任 藍適齊
 - | 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 張鑄勳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劉維開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周惠民

第一場次 《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之價值與應用 & 仁安羌作戰在中國軍事史的意義

- 《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之價值與運用 57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楊維真
- 仁安羌作戰在中國軍事史的意義 66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楊維真

第二場次 1942 年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的戰略構想與備戰部署 & 盟軍眼中的中國遠征軍：從英國檔案看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

- 1942 年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戰略構想與備戰部署決策的折衝 79
|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上校教官 王懷慶
- 盟軍眼中的中國遠征軍：從英國檔案看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 107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
| 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應俊豪

紀念仁安羌戰役 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

馬英九 中華民國第十二、十三任總統、馬英九基金會董事長

政大人文中心藍適齊主任、周惠民前主任、劉偉民董事長，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學：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馬英九基金會很榮幸再度與政大人文中心合作，辦理「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 80 週年座談會」。80 年前的 4 月中，國軍新編第 38 師第 113 團劉放吾團長依據英緬軍司令斯利姆 (William J. Slim) 將軍的親筆手令，在 17 日率國軍新編第 38 師第 113 團趕到仁安羌與日軍第 33 師團第 214 聯隊激戰兩晝夜，擊退日軍後，救出被日軍圍困的英緬軍第 1 師（含砲兵與裝甲兵一部），英軍就是在 19 日傍晚獲救解圍的，當士兵看到中國遠征軍時，紛紛大喊：「中國萬歲！」。「仁安羌大捷」，是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最重要的一役，而其指揮關係的爭論達 80 年之久，今日有幸再次探討這段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從 2017 年起，在周惠民前主任的卓越領導下，研究抗戰史斐然有成；他邀請相關專家學者組織研究團隊，至少舉

行 57 次會議、28 場的工作坊、學術研討會與論證會，發表論文 53 篇、出版 11 本專書；其中三場研討會：「紀念抗戰爆發八十週年」、「中國遠征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遠征軍與中緬印戰區」，我都有幸旁聽學習，獲益良多。

回顧二戰歷史，中華民國對同盟國最大的貢獻，莫過於將百萬日軍牽制在中國戰場，避免日軍在征服東南亞與南亞後，到中東與德軍會師。據說這是美國羅斯福總統當年最憂慮的夢魘。1941 年 12 月 9 日，珍珠港事變後的第三天，中華民國正式加入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行列，對日本、德國、與義大利三國宣戰。事實上，中華民國早在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後，就已經孤軍奮戰優勢日軍達四年半之久。身為盟國一員，當然應該援救正在緬甸與日軍作戰陷入困境的英軍，因此儘速派遣了一支赴緬作戰的菁英部隊——中國遠征軍。這不僅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與同盟國軍事合作的典範，也同時順勢保衛當時中國西南大後方的安全與補給線。

中國遠征軍第一次赴緬最著名的戰績當屬「仁安羌大捷」。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變後，日軍全力進犯東南亞，以奪取戰略資源，主要是石油和橡膠，一路攻城掠地，準備在攻陷緬甸之後進犯印度。1942 年 4 月中，日軍第 33 師團 214 聯隊（聯隊長作間喬宜大佐）以四千兵力，在緬甸仁安羌包圍英緬軍第一師及裝甲第七旅一

部共七千人，包括記者、傳教士與眷屬，當時天氣酷熱，缺糧缺水，戰況危急。英軍遂向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羅卓英將軍請求支援，國軍新編第 38 師第 113 團劉放吾團長乃奉命以不足一團僅八百餘人的兵力，從 4 月 18 日至 20 日與英軍的砲兵、裝甲兵協同作戰，以遠超出日軍意料的旺盛攻擊力，在仁安羌反覆衝殺，以寡擊眾，拿下 501 高地，擊敗四千優勢日軍，成功解救被圍困的英軍等七千餘人，締造轟動中外的「仁安羌大捷」。有西方國家稱此役為亞洲的「敦克爾克戰役」，顯然不當，因為仁安羌大捷是中國大勝，敦克爾克則為在歐英軍大敗後撤回英國，只是成功撤出英軍人數遠超出原先估計的 10 倍而已。我在 2012 年仁安羌大捷 70 週年前夕，特別請駐洛杉磯辦事處龔中誠處長，親赴劉放吾將軍之子劉偉民董事長寓所，代表我頒發遲到 18 年的「總統褒揚令」，以表彰劉將軍對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

當時中國遠征軍新 38 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 240 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 113 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斯利姆（William J. Slim）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斯利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

他由曼德勒經瓢背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 18 日晨 8 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 113 團，但在斯利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

然而，戰後由新 38 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而統一指揮仁安羌中英聯盟作戰的英軍第 1 軍團長斯利姆，在戰後出版回憶錄時為了掩飾英軍無力抗日，竟編造仁安羌被困英軍自行突圍而非被國軍解圍的謊言，令人駭異；而緬甸戰區英軍亞歷山大總司令（Harold Alexander）更傲慢無知，為了大英帝國的顏面居然說：「中國軍隊從未贏得過一次對日作戰」。竟欲以謊言取代歷史？我們豈能容許青史盡成灰？其實早在 1938 年 4 月魯南的台兒莊大捷，與 1938 年 10 月江西的萬家嶺大捷（武漢會戰的一部分），1939 至 1941 年湖南的三次長沙大捷，都發生在仁安羌大捷之前，當時國軍至少已經打了五次勝仗。我們絕不容許少數無知又不感恩的英軍將領的謊言污染國軍官兵用生命和鮮血締造的歷史。

在仁安羌大捷中，113 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 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長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

仁安羌大捷對我們中華民國有下列重大意義：

第一，這是二戰中國加入同盟國五個月後，中國遠征軍在海外打的第一場勝仗。

第二，這是日軍第 33 師團（師團長櫻井省三中將）在日本仙台成軍以來征戰中國大江南北與緬甸，第一次打的敗仗。

第三，也在 4 月 18 日，美國陸軍航空隊杜立德中校率領 16 架 B25 轟炸機從距東京約 500 海哩太平洋上的大黃蜂號航空母艦上起飛，轟炸東京等日本大城市，以報復日軍五個多月前對珍珠港的偷襲。仁安羌大捷與美軍空襲日本這兩件事，都大大振奮了盟軍當時低迷的人心士氣。而在仁安羌被救脫險的七千英軍，兩年後得以再投入印度戰場，在 1944 年 3 月英帕爾（Imphal）一役中大敗日軍，日軍陣亡 32,000 人；病故 46,000 人，震驚世界。

第四，後來西撤到印度的新編第 38 師和新編第 22 師進駐印度藍姆伽（Ramgarh），接受美式裝備和訓練後合併成立「新編第一軍」，參加反攻緬北作戰，在胡康、孟拱河谷擊潰日軍第 18 師團，並擄獲其關防大印。該師團是 1937 年 12 月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部隊，此役正好為南京 30 萬殉難的軍民同胞復仇。1945 年 1 月 27 日，

再與自滇西反攻的中國遠征軍在芒友會師，打通中印國際公路，到 3 月底，新一軍與英軍在喬梅會師，完成反攻緬北的遠征任務。

第五，中國遠征軍救援盟軍的義氣與展現的戰力，在當時國際社會受到普遍的肯定。英王喬治六世因此分別頒發「大不列顛帝國司令勳章」與獎章給予孫立人師長、劉放吾團長等有功官長。蔣委員長也分別頒授四等與六等雲麾勳章給孫立人師長與劉放吾團長。更重要的是，1943 年 1 月，仁安羌大捷的 8 個月後，英美兩國主動與我國分別在重慶與華盛頓廢除百年來締結的中英與中美不平等條約，取消了列強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另訂平等新約。百年桎梏，一旦解除；全國軍民，歡欣鼓舞。當時重慶還放假三天慶祝。後來政府將 1 月 11 日訂為司法節。這是蔣委員長實踐 1925 年國父在遺囑中主張儘速「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重要政績。10 個月後，1943 年 11 月，美、英更邀蔣委員長參加「開羅會議」，我國逐漸成為全球四強之一，《開羅宣言》中明文規定：日本竊自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三省、臺灣、澎湖，應歸還中華民國。這為兩年後光復東北與臺灣、澎湖及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國遠征軍所締造的仁安羌大捷，直到半個世紀後仍備受推崇。1992 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曾在卸任後訪問美國時專程到芝加哥拜訪僑居當地高齡 93 歲的劉放吾將軍致謝，她情真意切，坐著輪椅

的劉將軍與家人至為意外與感動。柴契爾夫人這一次 50 年後的拜訪致謝，再次確認了劉將軍的傑出貢獻。2014 年，英國牛津大學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出版的暢銷書《被遺忘的盟友：揭開你所不知道的八年抗戰》（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序言中強調「中華民國在毫無勝算的情況下，堅持不投降、不妥協，血戰八年，牽制 80 萬裝備精良的日軍無法投入太平洋戰場，使同盟國得以在歐、亞兩個戰場上，贏得二戰最後的勝利。」這是一段對國軍抗戰表現客觀公允的歷史評價。七年前我在政府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的許多場合，常常引用，也要求國軍要多多引用。

在「仁安羌大捷」獲救的英軍費茲派翠克 (Gerald Fitzpatrick) 上尉，對二戰時邱吉爾與英軍對中國的輕蔑態度十分反感，因為感念中國遠征軍在仁安羌之役的犧牲奉獻，曾向英國政府請命，要正視這段歷史，並且在他晚年之際將他在緬甸的親身經歷寫成三本書，還原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的真相，表達對中華民國國軍的感謝。

2012 年，93 高齡的他特地從英國飛到美國洛杉磯，向救命恩人劉放吾將軍之子劉偉民董事長親自致謝。並三年連續來臺參加紀念仁安羌戰役、黃埔建軍 90 週年、與抗戰勝利 70 週年等三項活動。我也在總統府接待他，當面稱道他的盛情與正義感。2018 年 8 月費茲派翠克先生辭世，享嵩壽 99 歲。劉偉民董事長代表我出席在英國

的告別式，宣讀我的追悼文，並依照他的遺願，在棺木上覆蓋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費茲派翠克與我國的深厚情誼，是中國遠征軍光輝歷史中一段感人肺腑的小插曲。

因此，2015年我在總統任內，派員到緬甸迎回十萬遠征軍官兵英靈的牌位，在3月29日中樞春祭陣亡將士時隆重入祀忠烈祠。當天也有遠征軍官兵親友晚輩從大陸與海外趕來參加，劉偉民董事長當然在場。這也是忠烈祠啟用以來，入祀人數最多的一次。此外，劉董事長也出資在緬甸仁安羌戰場建立仁安羌大捷紀念碑，也就是當時的501高地，讓世人瞭解並緬懷這一場戰役的意義與犧牲官兵的英勇。紀念碑已在2013年1月13日揭幕啟用。

今天，這個議題得到國內更多專家學者的關注，可傳承給年輕世代，幫助中華民國在對日抗戰議題上，持續享有學術發言權，也能讓國人明白中華民國擁有臺灣主權的正當性；讓世界記得中華民國不該是「被遺忘的盟友」，讓我們明白中華民國曾經站上世界舞臺的關鍵原因。

今天劉放吾將軍的公子劉偉民董事長，因為疫情，只能在線上參加。他為了還原父親功業和歷史的真相，推動史料研究數十年。孔子在《中庸》說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劉董事長可說是典型的中國孝子。我也要在這感謝鼎力支持遠征軍研究計畫的各位先進，才得以更加彰顯中華民國的價值，預祝今日座談會順利成功，謝謝大家！

仁安羌決戰於八十年前的今天，當天中、美、英三國，在印緬戰區的最高指揮官，史迪威、亞歷山大、斯利姆、羅卓英、杜聿明、溫特頓，齊聚 200 公里外的瓢背盟軍指揮所。史迪威當天日記寫道：「我的人很怕日本人，肚子痛了半天，仁安羌今天的情況不是很妙，中國人進攻面過寬，斯利姆擔心緬甸師會被徹底擊潰。」在中、美、英高層都不看好的情況下，仁安羌大捷，中國遠征軍第 113 團，打出了「傳奇」，寫下了「詩篇」。

據當時合眾社戰地記者傑克·貝爾登 (Jack Belden) 記述，被救英軍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有的涕泗縱橫慶祝生還，有的握拳高呼：中國萬萬歲！當時跟隨史迪威將軍的懷曼 (Willard G. Wyman) 上校，後來當到美國的四星上將，曾經感嘆的寫下：「第 113 團的故事，真是一個壯麗的詩篇 (The story of the 113th regiment is really an epic)」。

仁安羌大捷，那是我們這個民族，在被人打得趴下的年代，少有的榮光。80 年來這段輝煌的歷史，是波濤壯觀，可也是歷經滄桑。

戰後，英緬軍司令斯利姆將軍的回憶錄「反敗為勝」，裡面卻是這麼說的：「中國軍隊沒有時間觀念，藉口官兵缺水，將發起攻擊的時間一再推遲」，最終，「英軍編成縱隊，未經激戰、自行走出來」。

英國緬甸戰區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更是乾脆，直接寫下：「中國軍隊從未贏得過一次對日作戰」。

仁安羌是英軍在緬戰中，最不光榮的一段歷史，英國人為了大英帝國和他們自己的顏面，或是英國人的優越感，無法接受英緬一師被中國軍隊解救的事實，而選擇在戰後各自的回憶錄裡說謊。當時亞歷山大是上將，斯利姆是中將，兩人後來都當到元帥，他們說的話就是歷史，他們說的「謊言」也是歷史。

「仁安羌大捷」為中國遠征軍，享譽國際的一場重要勝利，由誰指揮在國內爭議多年。被視為第一手資料的新 38 師仁安羌戰鬥詳報，內容已被證實以「不實居多」，加上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資料的開放，及「蔣中正日記」、「往來電文」等檔案公開解密，仁安羌之戰由團長指揮的真相，已概可認定。

記得小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看見父親獨自悶坐在房間裡，我探頭詢問時，發現父親眼眶裡閃著淚水，他長長嘆了一口氣，沒有說話。後來我才知道，那天他是因為看完了一部電影叫做《最長的一日》，想到了他自己。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才陸陸續續的感覺到父親心裡好像深埋著委屈。

1963年香港爆發的「冒牌將軍案」轟動兩岸三地。當年10月18日台灣的《徵信新聞報》也就是《中國時報》的前身，以顯著的篇幅刊出了大半版，標題為「光榮戰史從頭說 真假將軍揭謎底」，真將軍的故事和第113團英勇的事蹟，方為世人所知。

1992年4月11日，美國《世界日報》刊出標題為「仁安羌戰役五十週年 英國軍民不忘救援恩 余徹特向劉放吾致謝」。4月初在芝加哥 Ritz Carlton 酒店大廳裡，柴契爾夫人身著一襲紅色外套和黑色長裙，她一看到父親，就立刻快步上前，俯下身來，親切的握著坐在輪椅中劉放吾將軍的雙手。感性的說道：「老將軍，我聽過太多您的故事了，您當年不但解救了七千英國軍人的性命，也同時解救了許多其他人的性命。想想看，這些人，現在都已經到了第三、第四代了，他們的性命都是您救的。今天我代表英國政府和人民，對您表示我深深的感謝之意，將來希望有時間，能坐下來聽您詳細講述當年怎麼打贏仁安羌戰役。」

霎時間，我看到父親充滿笑容的臉上，浮現出異樣的光彩，眼眶中感動的都是淚水。料想這可能是父親戰役50年來第一次聽到這樣溫馨的話語。他回答說：「我是軍人，打仗是我的職責，英軍是並肩作戰的友軍，當友軍遇到危難的時候，解救他們，也是應該的。」為表示至高的謝忱，柴契爾夫人返回英國之後，還特別囑咐，時任

英國國防部長的馬爾康·芮夫金 (Malcolm Rifkind) 代表英國官方，正式致函劉放吾將軍表達謝意。

這段歷史的遺憾，終於在 50 年後得到了彌補，我第 113 團官兵的在天之靈，也得到了安慰。說起來也真的是不可思議，80 年前的一場戰役，結下了一位英國世界級的領袖與一位中國將軍 30 年前相會芝加哥的因緣際會，更為二戰歷史創造了一段傳奇佳話，這一切的一切，好像都是冥冥中的註定。



▲ 圖 2 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向劉放吾將軍致謝忱，劉放吾將軍之子劉偉民、媳王國媚夫婦隨侍在側

這麼多年來，柴契爾夫人當年說的那段感恩的話語，和她謙恭地俯身緊握著父親雙手的身影，經由媒體廣泛的報導，早已深植人心。柴契爾夫人作為世界級的領袖，代表英國政府和人民，向一位中國將軍面謝感恩，這是我們所有中國軍人的驕傲，也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寶貴資產。

2011 年馬英九總統追頒劉放吾將軍總統褒揚令。

2012 年 9 月，在仁安羌被救，奇蹟倖存的英國陸軍退役上尉費茲派翠克 (Gerald Fitzpatrick)，以 93 歲高齡，偕同妻子，首度踏上美國本土，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向當年領導中國遠征軍第 113 團，劉放吾團長的後人謝恩。會面期間，他留下了兩頁親筆簽名的資料，詳細描述了他親身經歷和目睹的仁安羌之戰，這份資料彌足珍貴。

次年，他再以親身經歷完成著作《中國人救了英國人——在緬甸》(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並以此書獻給劉放吾將軍和他的子女。該書還原了仁安羌作戰的真相，彰顯了中國軍人對日抗戰，和對世界和平做出的巨大貢獻。

在他的書中有這樣的一段：「中國軍隊在這次行動中重創了日軍在緬甸的迅速推進，以至於日軍必須停下來等待後援，而英國的

戰史卻刻意忽略了這次戰役。中國軍隊打亂並延阻了日本軍隊精心準備的進軍計畫，為混亂不堪、忍饑挨餓的殘餘英國軍隊向北脫逃提供了，僅有的一次機會。亞歷山大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刻意貶低了中國人的作用。在『亞歷山大回憶錄第七卷－緬甸』（第 93 頁）他寫道『中國軍隊從未贏得過一次對日作戰』，但我親眼目睹的事實並非如此。對於已故劉放吾將軍率領的中國遠征軍第 113 團這場華麗壯觀，猶如史詩般的仁安羌之戰，我是重要且僅存的見證者。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我一直在講述這個故事，但卻被歷任首相和國防大臣一再否定。」

在他的書裡，還有這麼一段：「一位年輕的醫生在我們啟程前找到了我們，說願意與部隊同行。於是，這位叫 Xavier 的年輕人的陪伴，成了我們第一次享有的醫療服務。這位可憐的年輕人，身上沒有配備任何醫療器具，卻在腰際皮帶上掛著一把左輪手槍，這不得不讓我懷疑他的醫術……。通常當醫生陪同那些再也走不動的士兵，落在部隊後面時，我們會在繼續前行時不久，聽到後方傳來兩聲急速的槍響。靠著那把 0.45 英吋口徑的手槍，醫生以最人道的方​​式，治癒了傷病們的痛苦。那兩顆子彈，就是這位年輕醫生可以給予這些病人的最仁慈的治療。」

斯利姆將軍在他的回憶錄裡也有這樣的一段：「英緬師突圍時，一些傷勢嚴重的官兵們不得已被留在救護車上。一位年輕的砲手軍官，自告奮勇地想回去看看他們的命運。在夜色的掩護下，他成功地回到了救護車停放的地點。救護車還在那，但裡面的傷兵不是被割了喉，就是被刺死。」由這些片段，你可以看出英軍當時的慘狀，如果沒有國軍解圍，他們哪有可能像斯利姆書上說的：「編成縱隊，未經激戰，自行走出來」。

父親生前從不提戰功，卻常說當年帶出去的子弟兵，許多卻永遠再也無法把他們帶回來。看不到妻兒，見不到爹娘，這些年輕的生命，為國家、為民族戰死沙場，甚至屍骨無存，先父每次和兒女提及此事，都會感慨而唏噓。我們可以感受到他老人家心底裡的那份心酸和悲涼。

近年來，尤其令人倍感傷痛難忍的是，二戰之後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的墓地和墓碑大多被鏟平，以致中國在二戰中用鮮血建成的功勳遺跡也被一一抹去；而英國在仰光建立的國家公墓，氣勢恢宏，整個大英國協在二戰中在緬甸陣亡的官兵，有遺骸的，沒有遺骸的，有名的，無名的，都在那裡得到了安息和祭奠。即便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也在戰後透過各種途徑，在全緬甸日軍曾經作過戰的地方，修建大量慰靈紀念碑，甚至連戰馬都受到供奉。

我們的父輩，中華民族的英雄，為國家犧牲生命，70年來，竟落得客死他鄉，魂歸無處，我們身為炎黃子孫，身為遠征軍的後人，面對此情此景，心中能無感慨？

2013年1月13日，我們劉放吾將軍的後人，在緬甸仁安羌古戰場，籌建完成「仁安羌大捷紀念碑」，為前輩先烈招魂安靈。做為後代子孫的我們，今後無論如何宣傳、如何紀念、如何歌頌，都不為過！

同年7月7日，將他們的靈位，迎回了湖南老家的南嶽衡山忠烈祠，了卻了他們的團長劉放吾將軍生前的心願，我真的此生何幸，能夠陪伴他們走完回鄉的最後一程。從緬甸仁安羌到衡山忠烈祠，不能算是一個很遙遠的路程，但我們的前輩先烈，卻整整走了71年！這裡有祖國的風，祖國的雲，同胞的關懷，家人的溫馨。讓我們的前輩先烈們，能夠在風光明媚的衡山忠烈祠，永永遠遠長眠安息。

2020年9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正式將「仁安羌大捷紀念碑」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父親去世後，我在整理他的日記時，看到了他引用唐詩陳陶的《隴西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父親一生戎馬，

馳騁沙場，但這短短的兩句詩，道盡了戰場的殘酷和無奈，更襯托出英雄們的兒女情長。縱觀古今中外，所有的戰爭歷史，不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愛，用血淚交織而成的嗎？

今年是仁安羌大捷 80 週年，過去 4 年多來由馬英九前總統倡導，政大人文中心周惠民主任精心策劃，邀集史學界的菁英，共同編撰《中國遠征軍系列叢書》，彰顯了中國遠征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大貢獻。

西班牙哲學家桑塔雅那 (George Santayana) 有兩句名言：「歷史會重演」、「不能銘記歷史的人，註定重蹈覆轍」。我也常說，一個尊重歷史的國家才会有希望，一個尊重歷史的民族才会有未來。

今天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感謝大家的參與，讓我們一起在這裡為那些千千萬萬在印緬戰場上為國捐軀的英雄烈士們致上我們最誠摯、最崇高的敬意！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中國遠征軍，我們的前輩先烈用鮮血和生命寫下的這部歷史。他們為國家、為民族所做出的貢獻，將「永垂青史」！



▲ 圖 3 歷史見證：仁安羌大捷紀念碑

圓桌論壇

遠征軍的研究必須繼續

周惠民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歷年以來，國內有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研究，分成兩個主要脈絡：從中國現代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對日八年抗戰的戰史及其影響，而且多從七七事變為其起點，有關北伐與剿共屬於另一課題。從世界史的角度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以歐洲戰場為主要觀察重點，從希特勒如何取得政權，建軍擴張，到發動閃電戰以下，直至敗亡為止；另有人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為起點，此後各地戰場合流，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爆發。這種歷史研究的劃分，各有其內在邏輯與理路，也都能充分解釋與說明戰爭的起因、過程與影響。

歷史研究的重要依據概為檔案，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課題，牽涉各國往來交涉與物資集中、人員訓練與武器採購等重大內政與外交活動。缺乏檔案，自然無法了解事件之原委與變化的關鍵。近年來，各國相關檔案雖早已陸續解密、公布，提供學者應用。但因路途遙遠，資料取得不易，常見少數學者，長期埋首於特定檔案館中，耙梳整理，而能成「一家之言」。但特定檔案館所藏者，究竟只限

於特定視角，未必能綜觀全貌。

數位技術的快速發展後，許多檔案館也先後將其所藏檔案數位化，提供學界閱覽。從此，學者既無需間關萬里、長途跋涉，只要遵守各館閱覽規則，便能「抄寫」特定檔案，且能隨時就一特定主題，隨時比對研究，更能盡其奧妙。此次中國遠征軍的研究計畫，便是在這種新的學術條件下，順利開展。參與計畫的學者除了利用國內與大陸地區所藏的各種檔案外，也徵集了大英王國、美國、德國、日本各地檔案，可以就遠征軍議題，從當年各國主事者的報告、書信，更認識、了解各國態度與做法。

此外，遠征軍課題貫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的畛域，將中國八年抗戰與 1939 年以後歐洲戰事及 1941 年以後的美國對日宣戰連結成一個共同戰場，在此戰場中，大英王國對中國的算計，美國欲為世界主導的心態，以及中國為爭取盟友的妥協，都因佐證充足而顯得格外鮮明。

遠征軍課題的研究頗為曲折，對兩岸而言，均有其心結：派遣軍隊前往異域，全屬重慶的決策，延安無法置喙，逮中共建政後，部分持節域外的遠征軍將領淪為階下囚，關押在北京的「功德林監獄」。功德林寺原是北京德勝門外的佛寺，清朝設置粥廠，賑濟貧民，

後改設「京師習藝所」，「收容犯人，令習技藝，使之改過自新」。1949年10月，該監獄隸屬公安部，再改為「北京戰犯管理所」。中共建政後，收容100多名高級戰犯，其中就包括遠征軍的重要將領杜聿明、廖耀湘、宋希濂等人。其他或如衛立煌列入「內戰戰爭罪犯名單」、或如張軫，雖降共但仍畫為右派。他們留下少數有關遠征軍的活動紀錄，如杜聿明的《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但終究不足。10餘年前，大陸推出的連續劇《中國遠征軍》首播時，兩岸許多中壯年以下的觀眾才頭一次聽聞「遠征軍」的故事。

來臺遠征軍的重要將領當中，羅卓英來臺後即賦閒，1961謝世，並未有相關著作；孫立人則因政治問題，早於1955年後即遭軟禁；陳誠因歷任要職，且得年不永，對這段軍旅活動也無暇論述。種種因素，使得國內有關遠征軍的研究，蒙上一些政治色彩，未能盡得其情。倒是許多遠征軍的家屬、故舊還能保存相關史料，「劉放吾將軍紀念網」、《傅克軍獨立工兵團與遠征軍的故事》都是後人為紀念其父輩而蒐集資料的成果。

在2006年以後，北京將中國對日抗戰擴大為「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研究，不僅將抗日戰爭的時間斷限向前延伸，也將抗戰戰場向外擴大，引起許多回應。「南洋機工隊」這個不為人所知的東南亞華僑回國參與抗戰的故事，忽然也搖身以電視劇型態而家喻戶曉。

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是中國現代史重要研究平臺，整合兩岸及世界學者，探討近現代中國各種課題。2017年開始推動遠征軍課題研究，除了邀集學者辦理研討會，出版專書之外，更與許多重要檔案館合作，搜整遠征軍相關檔案並出版為史料彙編，讓讀者更能接近歷史。4年多以來，政大推動的遠征軍研究有了初步成果。但這也帶出了更多的問題。諸如從遠征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位置，討論盟軍對遠征軍的態度與政策？大英王國對中國派兵的疑慮，包括印度、緬甸、西藏與「香港主權」問題？中國在太平洋戰場的貢獻？如何認識當時英、美兩國的「中國政策」？另一方面，從遠征軍自身的課題看，遠征軍戰術戰略的檢討明顯不足，遠征軍主要將領為何投入國共內戰戰場？遠征軍中的翻譯、補給、後勤問題？遠征軍如何復員、撤退來臺？

許多學者已經從文獻中檢討大英王國對華的態度，以及英、美間的角度等切入討論遠征軍議題。今後，更應從中國的立場，檢視太平洋戰爭後的國際局勢發展，並將中國戰場與世界戰場連結，探討戰場間的連動關係。例如日本在緬甸軍事行動如何受到西太平洋戰事發展的限制，因而減輕遠征軍的應戰壓力等。

歷史研究力求照顧全面，惟仍需從自己的立場觀察，提出看法與解釋。當時間稍遠，情感與理性逐漸平衡後，自然會有新的闡述。

仁安羌大捷已經是 80 年前的事件，逐漸脫離許多人的生活經驗，進入歷史的領域。新世代的學者握有更完整的資料，越發可以縱覽全局，自然有義務提出新的理解。讓世人從不一樣的角度，觀察 80 年前爆發的太平洋戰爭。

歷史爭論的解答

張鑄勳 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

1942（民國 31）年春，中國遠征軍第一次緬甸作戰時期，國軍新編第 38 師第 113 團在團長劉放吾指揮下，於仁安羌地區擊敗戰力優勢的日軍第 33 師團第 214 聯隊，救出即將被殲滅的英緬第 1 師。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等盟軍在亞洲一路敗退，此戰是盟軍的第一場勝利。展現中國獨自對日抗戰已逾 4 年半，持續戰力還是能打、敢打，並能以寡擊眾，戰勝頑強的日軍；也願意善盡聯盟義務，為解救盟軍不惜犧牲做出重要貢獻，成為探討遠征軍作戰必然彰顯的一役。也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指揮盟軍的步、戰、砲協同作戰，特具意義。卻也留下兩項爭論，一為仁安羌作戰由師長或團長指揮。另一、英軍高階指揮官難以接受英軍被中國軍隊所救的事實，在戰後撰寫回憶錄時，掩蓋事實誤導歷史。這些疑點需要澄清。

仁安羌作戰為第 113 團劉放吾團長奉命受英軍軍長斯利姆（William J. Slim，所轄兵力為 2 個步兵師 1 個裝甲旅，等同軍級部隊，以下稱軍長）中將指揮，4 月 17 日奉命前往仁安羌地區解救被圍英軍，18 日拂曉即將發起攻擊時，師長孫立人將軍從曼德勒趕到戰場，

遂產生此戰由師長孫立人或團長劉放吾指揮的爭論。此次的研究以史料為依據，從法律層面、戰爭理論、軍事準則，結合作戰實務檢驗戰場景況，藉以探求歷史事實。劉放吾奉羅卓英命令歸斯利姆指揮，係經由中央聯盟會議並奉蔣中正核定。此後第 113 團的指揮權，在法律基礎上已經從孫立人轉移至斯利姆。劉放吾前往仁安羌替英軍解圍，也是奉斯利姆手令而非孫立人命令。孫立人雖然趕到仁安羌，並沒有改變原來的身分，仍然是受杜聿明指揮的曼德勒衛戍司令，其法定職責為積極完成戰備確保曼德勒，無關仁安羌作戰。

17 日下午，第 113 團趕到賓河北岸的戰場附近，獲得英軍支援戰車、砲兵各約一個連。立即偵察地形敵情，召開作戰會議研討行動方案，策定計畫下達命令，實施步戰砲協同作戰的編組，完成作戰準備。18 日拂曉在攻擊發起線展開向敵發起攻擊，《仁安羌戰鬥詳報》記載，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孫師長從幾百公里外的曼德勒趕到仁安羌，如果也指揮第 113 團作戰將干涉斯利姆的指揮權，軍隊必須統一指揮，不容許出現雙頭馬車的現象。且孫師長星夜趕到，地形不熟、敵情不明、協同作戰編組不清楚，匆匆趕到戰場尚未進入狀況，如何指揮作戰。《步兵團》準則明文規定：「團長負責全團一切成敗全責」，「團的作戰指揮為團長職責」。從準則規定和戰場實況檢視，第 113 團的作戰為團長指揮。另有指師長到達後，斯利姆軍長把戰車和砲兵交由師長指揮，則未見到具公信的史

證有此記載。在作戰實務上，步戰砲協同作戰必須統一指揮，保持協調連繫，方可發揮統合戰力達成任務。《戰爭原則釋義》闡示，對同一作戰目標，或在同一方面作戰之各部隊，不論其軍種兵種必須有其單一的最高指揮官。英軍是當時的現代化部隊，協同作戰行之有年，斯利姆不可能違背原則，只因師長到達，就把已完成步戰砲協同編組的第 113 團交給初次見面了解不深，而且尚未進入狀況的中國師長指揮。而把策訂計畫、下達命令，與全團主要幹部經過協調，建立默契，並完成一切作戰準備的團長擱置一旁。此刻部隊已經展開，即將發起攻擊，若把戰車、砲兵抽調出來交由師長指揮，為臨戰拆散協同作戰編組，必須修正作戰計畫，重新調整部署。

若造成部隊混亂則決戰必無勝算，英緬第 1 師將被擊滅。斯利姆已經是中將軍長，作戰經驗豐富，不可能冒此風險。第 113 團是他唯一可以解救英軍的部隊，必定維持團的協同戰力完整。親自指揮被日軍隔離在賓河南北兩岸的盟軍，才能直接而迅速的指揮與協調中英兩軍，避免兵力互擊或火力誤傷，並發揮統合戰力救出英軍。斯利姆沒有對日作戰經驗，再加上孫立人師長曾留學美國，英語流利，因此同意他留下來便於提供意見。在仁安羌作戰時期，孫將軍係以客卿身分發揮建議及協調功能，須在斯利姆軍長授權下始能到前方督戰與指導，是落實斯利姆的作戰構想，不是按自己意志指揮作戰。研究仁安羌作戰通常以《仁安羌戰鬥詳報》為重要參考，此

戰係第 113 團參戰取勝，《仁安羌戰鬥詳報》則由新 38 師師司令部戰後編撰完成，聚焦師長指揮，不見團長作為，內容已被證實以不實居多。如軍隊各階層作戰計畫的規格都有統一標準，3 個營的作戰計畫是團參謀群依據團長決心及構想，在團長指導下分工合作完成，由團長召集下級部隊長下達命令貫徹執行。《仁安羌戰鬥詳報》作戰二天的命令，主戰兵力都是三個步兵營及英軍支援的戰車、砲兵，證明是一份團長指揮作戰的命令。標題則冠以新 38 師的稱號，移花接木誤導為師長指揮，另外增加一則沒有執行的師攻擊命令與規定不符等。從法律、理論、準則、作戰實務及戰鬥詳報的檢驗，仁安羌作戰由團長劉放吾指揮。

統一指揮仁安羌中英聯盟作戰的英軍軍長斯利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版類似緬戰回憶錄的《反敗為勝》。其中記載仁安羌作戰時，指國軍未按時發起攻擊，推遲至下午 3 時才行動，以營造英軍自行突圍的假象。他記述英軍編成縱隊，未經激戰，沿著狹窄而崎嶇的路面和小丘，蹣跚行走至賓河邊自行脫困。緬甸戰區總司令英軍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上將的回憶錄記載：「中國軍隊從未贏得過一次對日作戰」。兩人都是緬甸作戰時期的高階指揮官，寫下不實回憶錄誤導史實，影響中國軍隊的聲譽，亟需澄清。

當時媒體的報導則完全不同。摘要如次，1942年4月21日重慶《大公報》大標題：「我軍攻克仁安羌，油城重見天日被圍英軍救出」。¹次日亦刊出相關報導：「中央社倫敦二十一日路透電：克復油田中心仁安羌一事，消除英軍陣線完全崩潰之危機。」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三日專電：美國報紙咸以顯著地位，登載華軍克復伊洛瓦底江仁安羌油田及救出英軍之消息。各報的大字標題為「仁安羌之捷美各報讚揚」、「華軍拯救緬甸盟軍」、「史蒂威爾部下華軍擊退緬甸敵軍」、「華軍解救在緬被困英軍」，及「華軍攻進緬甸油田」。」除國內媒體外，國際新聞包括倫敦、華盛頓及美國各媒體都廣為報導，緬甸、新德里等英國屬地同樣登刊捷報。中國軍隊在仁安羌替英軍解圍無庸置疑，不是斯利姆和亞歷山大所能掩蓋。

具體事證見於仁安羌戰場，4月16日深夜，日軍分兵南北，各以一個大隊佔領通過賓河幹道的兩岸要點，截斷英緬第1師退路。17、18兩日英軍突圍不成，再無能力自行脫困。國軍第113團奉命受斯利姆指揮，前往解救英軍。18日的作戰，於午時擊退賓河北岸日軍，在渡河攻擊時受到南岸日軍的頑強抵抗，遂暫停攻擊，準備明晨再戰，雙方形成隔河對峙狀態。仁安羌戰場的形勢，日軍處於中央位置，南北兩面作戰。對照中日雙方的戰史，國軍戰史記載：19日4時30分，第113團在夜暗掩護下渡河，迄拂曉迫近敵人陣地

1 〈緬境捷報 我軍攻克仁安羌 油城重見天日被圍英軍救出 我軍正面刻阻敵於平蠻〉，《大公報》（重慶），1942年4月21日，版2。

發起攻擊。劉放吾是當天指揮作戰的團長，追憶作戰經過：「以午前 8 時 30 分至午後 1 時許最為激烈。敵人曾以大隊飛機及砲兵，向我部隊作猛烈轟炸和砲擊。步兵在飛機大砲掩護下向我反撲，幸賴將士用命，前仆後繼與敵反覆衝殺，數次肉搏，卒將頑敵擊潰。」²從午前 8 時 30 開始進入激戰狀態，則攻擊發起時間更早，當在晨間。日軍戰史記載：18 日，晝間擊退突圍英軍的第 214 聯隊，隨著英軍於日沒後停止攻擊，而整頓戰線以備翌日戰鬥。聯隊長作間大佐集結全力於英軍東北角（道路集合點），命令高延大隊、中井山砲大隊、杉浦第二大隊在此地集結。並命率部趕來增援的第一大隊長德重房夫於明晨拂曉突進至英軍側背實施側擊。

翌 19 日晨，英軍再度集中全火力於其東北角發起攻擊，展開一場激戰。另一方面，位於北方賓河之敵增強兵力（國軍第 113 團發起攻擊），聯隊長不得已再增援一個中隊至該方面。由於北方賓河方面的中國軍隊攻擊更加猛烈，迫使日軍抽調兵力向北增援。從日軍戰史的記載，證明國軍第 113 團發起攻擊的時間與英軍概同，都在 19 日晨，證明國軍並未推遲攻擊。14 時攻克戰場要點 501 高地，一面肅清殘敵，一面固守要點掩護英軍撤退，於是被圍英軍全部約 7500 餘人，傍晚均獲解救。東京《朝日新聞》轉載日本陸軍的戰況報導：「仁安羌戰鬥於 4 月 17 日以奇襲展開，捕殲英印聯合軍，英

2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香港：今日出版社，2007 年 5 月 4 版），頁 27。

方以重慶軍的支援作為唯一倚賴。」³ 指出被圍英軍得以撤出係中國軍隊所救。斯利姆指「國軍推遲至下午 3 發起攻擊」，亞歷山大回憶錄記載「中國軍隊從未贏得過一次對日作戰」，均為不實記載。

1992 年，仁安羌大捷 50 週年前夕，英國前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訪美時，特別在芝加哥會晤劉放吾將軍。代表英國政府及人民，感謝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指揮所部解救英軍。為表示至高謝忱，返回英倫後，還特別囑咐時任英國國防部長的馬爾康·芮夫金（Malcolm Rifkind）代表英國官方正式致函劉放吾將軍表達謝意。都確認國軍在仁安羌作戰時，戰勝日軍解救英軍的歷史事實，也撫慰了第 113 團為解救英軍而壯烈犧牲的官兵在天之靈。

3 〈マンダレー攻略の経過〉，《朝日新聞》（東京），1942 年 5 月 5 日，版 2。

徵集遠征軍史料的重要性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很榮幸有機會參與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 80 週年座談會。我從 2017 年受政大人文中心前主任周惠民教授邀請，參加「中國遠征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計畫，到現在已經 5 年。我的研究領域之一是「民國檔案與史料」，因此在參加研究計畫的過程中，對於相關史料搜集特別注意。人文中心在執行這項計畫時，從兩岸以及美、英、日等地的史政與檔案機構搜集大批相關檔案，同時也徵集許多參戰者的回憶、新聞記者的隨軍報導等資料，並將這些檔案資料匯集為一個內容豐富、數量相當龐大的資料庫，今天所呈現的《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就是由資料庫整理出來的部份成果。這個資料庫如果隨著「中國遠征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計畫的結案而封存起來，將使過去幾年為搜集資料所花費的人力、物力顯得沒有意義，我個人認為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因此如何能讓這些檔案資料獲得更進一步的運用，使研究者能在現有的基礎上，對中國遠征軍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應該是後續需要考慮的工作之一。

中國遠征軍兩次入緬作戰在整個八年對日作戰中，是國軍在國

境外的作戰，它的依據是中華民國做為同盟國的成員之一，中國軍隊是盟軍中國戰區的主要作戰部隊，國軍的入緬作戰是整個同盟國作戰的一部份。中國人一向注重歷史，當全面抗戰發生之後的第三年，1939年初，在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之下成立戰史編纂委員會（戰史會），負責搜集各場戰爭結束後所留下作戰過程的資料，並據以編輯該場戰爭的戰史。1946年5月，國防軍事機構改組，成立國防部，下設史料局，掌管國軍史政業務，惟戰史會之抗日戰史編纂工作尚未完成，仍持續進行，至1948年底初稿完成，送交史政局保管，並於1949年移轉至臺灣，然而編纂戰史之資料則因數量龐大，未能攜出，現存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二檔館），為「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中包括仁安羌作戰戰鬥詳報等多件資料即來自於該檔案。攜至臺灣的戰史初稿經國防部史政局整編後，於1960年代奉准出版《抗日戰史》，全書共100冊，另有「總目錄」1冊，為目前唯一一套完整記錄自九一八事變至抗戰勝利受降的對日作戰的戰史。

我因為參加「中國遠征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計畫，對於《抗日戰史》的編纂經過產生興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管局）在多年前接收國防部移轉1950年之前的「國軍檔案」，其中有通稱為「柏溪稿」的《抗日戰史》原稿，以及戰史會編纂戰史的會議紀錄。但是受戰亂影響，檔案局僅有1947、1948年的會議紀錄，

其餘在南京的二檔館。我曾經請學生在二檔館查閱檔案時，幫忙影印該館所藏的會議紀錄，得以與檔管局檔案合併檢視。我在查閱會議紀錄時，發現參與戰史編纂工作人員對於戰史中的相關問題的處理相當用心。例如戰史中要列「八年抗戰戰鬥統計調查表」，對於何謂「戰鬥」，修纂人員經過反覆討論，決定由任務、兵力與重要性三方面作為「戰鬥」範圍的準則；又如對於戰史內容，亦反覆討論所陳述是否確實。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討論 1944 年長衡會戰的兵力問題時，戰史會主任委員方昉多次強調國軍兵力不可以番號計算，所持理由除了兵力損耗無法及時補充外，亦與遠征軍入緬作戰有關，他說：「檢討我軍兵力，經過一次會戰，其戰鬥力即削弱一次，因適當之補充制度未確立，頗難迅速恢復戰力，所以不能僅以番號計算兵力，況本戰場曾抽調一部分精銳兵力至滇緬路作戰，為維持國際信義，雖當時國內兵力不足，亦不惜犧牲，極力忍耐，未予抽調，此點可在總經過內敘述之。」從會議紀錄，也可以了解《抗日戰史》雖然是「戰史」，但是它的編纂是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目的，提供軍方參考，內容全然以戰前準備、作戰經過、戰後檢討為主，因此不免遭到「內容枯燥」之類的批評，但是無論如何，《抗日戰史》至今仍然是研究對日作戰必須參閱的書籍，同時也是我們掌握抗戰話語權的最重要依據。

對日八年抗戰是一個整體的概念，它是由規模大小不等的會戰、

戰役、作戰等所構成，我們要如何深化對日抗戰的研究，「中國遠征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計畫是一個很好的範例。除學術研究外，更編輯《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一書，完整蒐集仁安羌作戰相關檔案，同時也是少數以對日抗戰單一作戰為主題的史料專輯。編輯過程中，除了得到兩岸史政及檔案機構的協助外，人文中心同仁對史料的整理更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他們除了比對不同檔案上相同人名、地名的不同譯名外，同時發現分別典藏在不同機構但是內容完全相同的電報或報告，有不同的處理流程。如國史館所藏，係由軍事委員會秘書廳上呈；南京二檔館所藏，係由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上呈，顯示軍事委員會內部對於電報或報告處理有不同的流程，值得日後再加以研究。

最後，關於仁安羌作戰與劉放吾將軍的功績，國軍方面早有定論。2015年是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防部特別製作「勇士國魂」月曆作為紀念。其中9月的主題為「遠征境外、揚威異域」，說明「國軍編組精銳部隊進入緬甸作戰，於仁安羌一役以寡擊眾，協助英軍突圍脫困，創下境外作戰勝利紀錄」。內附6幀照片，其中2張以仁安羌作戰為主，一為「遠征軍於仁安羌擊敗日軍救出被圍英軍，這是勝利後的合影。」一為「劉放吾團長率新38師113團於緬甸仁安羌解救被圍困之英軍、美國傳教士以及記者，共7,000餘人，史稱『仁安羌大捷』。」以上報告，謝謝！

圓桌論壇逐字記錄

時間：2022 年 4 月 29 日

主持人：藍適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人文中心主任）

與談人：張鑄勳（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

劉維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周惠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藍適齊：

我想圓桌論壇的目的，一方面是回顧今天的討論，更重要的是，中國遠征軍研究計畫，從 2017 年開始到現在，已經執行了 5 年，我們非常希望能夠做一個回顧。接下來會請 3 位老師：周惠民老師、張鑄勳將軍、劉維開老師，就不同的面向跟各位做進一步的分享。我希望周惠民老師除了談今天的主題之外，也可以為我們回顧過去 5 年來，整個研究計劃進行的情況，還有未來的開創性。

周惠民：

我想就分成幾個層次來回答，或者來開展藍主任所交代的任務。第一，在成果方面，剛才楊維真教授已經討論過我們整個相關研究的成果發表，包括出版各種不同書籍，召開各種不同工作坊；在檔案使用方面，可能是我們最重視的一環。現在正在編輯，快要出版

的就是：《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

剛才也提到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館的檔案加入，其實遠征軍的相關課題，對中國大陸的歷史研究來講不是一個主流。主要原因是，中共跟這次的遠征軍工作計畫完全沒有關係，就好像是另一個關於南洋技工隊的問題，所以他們對這個課題，本來就沒有任何興趣。另外，在國共內戰時期，遠征軍的許多將領，紛紛獻貢給北京的功德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監獄，比如杜聿明等人都在這個地方。但因為推動這個計畫，我們有一部分資料是保存在南京二檔館。南京二檔館的相關資料，最早是在抗戰結束後開始搜集，當時蔣中正委員長下令搜集各種不同的檔案資料，準備開始編寫國軍戰史。蔣先生對於戰史的寫作非常重視，從一開始指揮東征軍隊時，就開始編寫，這些戰史資料，通通就放在南京二檔館，但當時國民政府，許多資料沒有來得及撤出來。執行遠征軍計畫的過程，時任二檔館館長的馬振犢館長，同意跟政大人文中心合作，把一部分的檔案交給我們運用，這就是後來整理成《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的重要資料之一。

另外，馬館長當時也推動一個相關計畫，要到雲南收集資料，也邀請我們去參與，楊維真教授因此就到雲南去了。所以我們這個計畫，對於檔案的集中、編輯、整理、解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現在，我們還推動了，當初各個國家所保存的遠征軍史料彙編。當然最重要指的就是美方跟英方的資料。剛才，應俊豪教授也特別說了，資料非常的多，三、四年的時間，沒有辦法完全消化、解釋完畢。這方面也邀請到了香港的鄭教授跟我們一起合作，希望這個工作能夠繼續下去。

前幾天，我們還開了個簡單的黃埔建軍戰史的寫作計畫，在當中我們順帶提到遠征軍的問題，覺得有幾個課題可能可以繼續發展。第一個，就是應俊豪教授一篇報告所提到的「盟軍眼中的遠征軍」。應教授給我們許多非常重要的解釋，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應該繼續開展。第二個，復原制度下，遠征軍後來的結果如何？許多遠征軍將士們，投入了後來的國共戰場，這些人後續整體發展如何？也可以繼續討論。無可諱言，遠征軍在臺灣並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孫立人將軍也一直是個禁忌。所以說，這方面的研究我覺得是欠缺的，我們應該要補上。

另外一個，許許多多的官兵遷臺之後的發展，受到了政治牽連，很多人的待遇、境遇並不是非常好，我們是不是應該再重視這方面的課題？譬如說，劉放吾、劉將軍這樣一個貢獻卓著的人，為什麼到臺灣以後，他的發展並不理想？甚至於跑去賣煤球？這些東西是中華民國政府虧欠了他們，但是，有它的時代背景。我想這也是我

們可以再繼續往下討論，尤其是許多人的撤退經驗。現在很多人在研究大流亡、大轉境，但這些「人」的經驗如何？許多官兵到臺灣的這一段艱苦歷程，也牽涉到臺灣歷史的解釋，比如說，關於所謂的「戒嚴」問題。實際上，我們現在所說的長期戒嚴令，在當初原意並非如此。陳誠在公布臺灣戒嚴的時候，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阻止大量的共匪進入臺灣，所以要進行管制。管制的結果是許多人被拒在外、不得其門而入，經過輾轉周折，像這種撤退經驗，也是我們可以發展的一個工作課題。

最後一個，當然就是兩岸如何書寫遠征軍的課題。在 2006 年以後，胡錦濤開始要推動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遠征軍從一個被遺忘在角落的歷史課題，慢慢隨著抗戰的歷史一併往前提了。我們要看中共如何去解釋這些問題？例如，中華蘇維埃的成立實際上並不是以抗日為主，它是要打擊國民黨政權。但最後卻突然變成是在維護中國主權、打擊日本，像這樣的歷史書寫，我們需要再重新解釋，並了解他們做這樣改變的原因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如果我們自己放棄了歷史的解釋權，那將來，30 年、50 年之後，國人如何認識抗日戰爭？如何認識中日問題？如何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認識遠征軍？所以我想，有關遠征軍的書寫，兩岸不同視角的討論，都應該是研究遠征軍課題時，要繼續往前發展的。如果在座的年輕學者朋友能夠加入我們的研究團隊，我們再想辦法募足

一些資金繼續推動這個研究，不要讓遠征軍的研究止於中道，止於半途，能夠繼續往下走是我們所期待的，謝謝。

張鑄勳：

今天因為時間不太夠，前面有二個問題還沒有回答，我就利用這個機會說明。提到仁安羌不到千人實力怎麼能打敗約 3 千人的聯隊？這是個很好的問題，經常有人在提。我從理論上做個解釋，可能更容易理解。就用李德哈特（Basil H. Liddell Hart）說過的間接路線來做解釋，他的論點在從精神上、形態上使敵人失去平衡，這個攻擊就會贏。當時第 113 團在召開作戰會議時，盟軍指揮官斯利姆將軍和孫立人將軍都到場。孫立人將軍的建議是從左邊為主攻，因為左邊地形較平坦，戰力容易發揮；而斯利姆認為英軍將來也會從他們的右邊出來，這樣雙方都利用東邊地形較佳的路線攻擊，兩軍相向而行時的火砲可能會誤擊，甚至通信不通或協調欠佳，就敵我不分的打起來，到靠近了才知道是自己人，戰場上曾經發生過，何況當時中英兩軍的第一線部隊，通信是不通的。應該為了安全上的考慮，斯利姆決定第 113 團的主攻路線從西邊突進，但西邊的地形比較陡，有許多雜樹叢，還有岩石等，很不好走。斯利姆下定決心，113 團也只得冒險從這邊進攻。英軍根本想不到第 113 團會從複雜的地方冒險過來，就產生心理上的奇襲效果。再者，日軍因為要圍困英軍，整個作戰正面對著南方，它的陣地構築、兵力編組、火網編

成都針對英軍的突圍而準備。北方突然間來了一支部隊，一個團近千人的力量也是夠大的，從背後打下來直擊弱點，日軍即使有三倍兵力也難承受，就造成物理上的喪失平衡。這個心理奇襲與物理打擊，造成日軍的不平衡，戰力難以發揮，是造成日軍潰退的原因。就如同一個大水壩，水儲存在裡面維持一個平衡狀態，就像陣地一樣堅固穩定。但是從結構力學上的幾個關鍵要點把它爆破開，除破口外還產生許多裂縫，水庫的結構力就失去平衡，裡面水的重力就會把堤壓垮，水壩就會崩潰。根據這個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第 113 團能夠以少數的兵力去打敗強敵。

至於英軍支援第 113 團的戰車和砲兵各約一個連如何運用，成效如何？也常引起討論。戰爭原則指出：對同一作戰目標，或在同一方面作戰之各部隊，不論其軍種兵種必須有其單一的最高指揮官，負其全權指揮責任，各國概約循此原則。第 113 團到達賓河北岸，準備替英緬第 1 師解圍，英軍賦予戰車 12 輛，砲 8 門。支援作戰，必須編成步戰砲協同作戰部隊，統一計畫，統一指揮。抗戰時期，軍事委員會的準則規定，戰車和砲兵以協助步兵達成任務為主。所以英軍戰車和砲兵由劉放吾團長統一指揮。至於戰車的作戰效益，說法各有不同，盟軍指揮官斯利姆指出：賓河北岸的中國部隊打到河邊，雖然清除敵軍，但沒能解決淺灘上設置的路障，戰車受到河床的軟泥限制，無法驅散日軍。又指：南岸英緬第 1 師的戰車部隊

嘗試排除路障，則被日軍反裝甲武器擊敗。更嚴重者，戰車受地形阻礙，而成為被集中射擊的目標。以斯利姆的記述，說明英軍戰車在賓河南北兩岸的作戰，都受到地形限制，及日軍設置障礙與火炮射擊等影響，效果不彰。斯利姆是英方指揮官，最了解狀況，認為效果不彰可以定論。日軍戰史記載：仁安羌附近的地形，標高差雖不過 50 公尺左右，但高低起伏極為錯綜複雜。由於侵蝕作用使地隙變成斷崖，到處構成自然的反戰車壕，對我方的反戰車戰鬥是絕佳的地形。敵以戰車為先頭，反覆對幹道強行突破，但被奮戰的中井部隊所阻無法前進。日軍是實際與英軍作戰的部隊，可以印證史利姆的說法，並指出英軍戰車效果不彰的原因。〈仁安羌戰鬥詳報〉記載：步砲戰協同作戰確實，英砲兵射擊準確，予敵打擊甚大，而未見記載戰車效能。歸納交戰三方的評析，戰車適用於平原或丘陵地區，仁安羌的地隙溝壑及河床軟泥形成障礙，限制其機動力、衝擊力及震撼力的發揮。造成英軍戰車的戰鬥以運用直射火炮及機槍為主，在日軍反裝甲武器結合地形的打擊下，作戰成效有限。

第二點，講到曼德勒會戰是很複雜的問題。周惠民教授這次希望蒐集一冊史料彙編，歷史上許多疑惑和爭議的地方，就可以從檔案中找出資料來研究，解決問題，是很好的構想。這次解讀的曼德勒會戰是蔣委員長在緬甸的戰略指導，約瑟夫·史迪威到重慶報到後，蔣委員長就花很多時間說明曼德勒的會戰計畫，史迪威沒講話，

也可能紀錄上沒寫吧。我們不了解他心裡怎麼想？就去找他的日記，發現他對蔣委員長的觀點並不認同，所有的牢騷都寫在日記上。我們把兩人的資料對照看，蔣委員長決定退到後面的曼德勒，設置口袋陣地，引敵深入包圍殲滅。等遠征軍的部隊全部到達後，再和日軍決戰，先集中兵力擊滅日軍主力，再南下收復仰光，打通滇緬公路。類似長沙第三次會戰的後退決戰，側背打擊。史迪威則主張把遠征軍的主力第 5 軍推進到前面的同古與日軍決戰，再直接南下仰光。兩人的看法不同，於是蔣委員長授權史迪威到緬甸指揮遠征軍作戰的手令，除了交待要絕對服從史迪威的命令外，還律定決戰地區必定在曼德勒，不能行險冒進。史迪威到緬甸則違背蔣委員長的手令，下令在同古決戰，結果戰力不如日軍，前面的第 200 師奉命撤退。後面的曼德勒會戰也沒有準備，因為整個部隊都調到前面去了。遠征軍的作戰就成為不按既定計畫，缺乏充分準備的作戰，沒有時間停下來重整戰線再和日軍決戰，不得不退出戰場。

一個錯誤的決心，比兩個正確的決心為佳。因為戰爭敵情不明，狀況混沌而充滿不確定性，所以有「戰爭之霧」的說法。勝負是錯誤的累積，誰的錯誤小，勝利公算就大。一個錯誤的決心，觀念一致力量集中，還是有贏的機會；兩個正確的決心，觀念分歧力量分散，則失敗機率較大。大軍作戰的戰區遼闊、部隊龐大、後勤複雜，具計畫性和鈍重性。指揮作戰必須先期規劃、策訂全程戰略構想、

下達重點指導、完成作戰計畫，全程貫徹執行以掌握戰場主動。史迪威未按蔣委員長手令執行會戰計畫，統合戰力未能發揮，處於被動位導致失去勝利。

藍適齊：

非常感謝張將軍從軍事理論跟軍事實務上面，讓我們對遠征軍的作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接下來請劉維開老師給我們做一些評論，謝謝。

劉維開：

我從 2017 年就受周惠民教授的邀請參加「中國遠征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計畫」，到今年計劃已經算是一個很圓滿的結束。今天我們在這邊討論的，主要是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的出版價值與應用。我個人並不是做這一方面的研究，我的研究著重於史料方面，我在參與這個研究計畫的時候，對於中國遠征軍研究計畫裡關於史料的蒐整有很高的興趣。中國遠征軍計畫收集了非常多的資料，包括當時的戰報，還有各檔案館留下來的資料，甚至包括最近中國大陸在推動的老兵口述訪問，我們都設法去交涉取得。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我最有興趣的部分是檔案，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中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國史館跟中國大陸的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國史館主要就是蔣中正總統檔案裡面所保留的資料，給我們很大的幫

助。但另外一個部分其實是來自於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剛剛周主任也提到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檔案資料，對於這一次的資料蒐整給予了非常大的協助。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資料？追本溯源是來自於抗戰時期。在抗日戰爭發生的第 2 年，當時軍事委員會改組，在軍令部底下成立了一個戰史編纂小組，後來這個戰史編纂小組就成為戰史編纂委員會，抗戰勝利後，軍事委員會結束，戰史編纂委員會本來應該隨著軍令部結束。但他們認為抗日戰史的工作並沒有完成，所以要求延長。經過當時的參謀總長陳誠的指示，成為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這個戰史編纂委員會一直到民國 37 年，才把抗日戰史的初稿大致完成。到了民國 38 年 4 月，南京失守前，把這個資料交給了國防部史政局，國防部史政局再把抗日戰史稿從南京一路帶到了廣州、重慶。曾經擔任過軍令部部長的徐永昌在日記裡就記了一段，他到重慶後突然有一天想到，當年辛辛苦苦編纂的抗日戰史，現在究竟怎麼樣了？於是他就指示當時戰史編纂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方昉，指示說要去查一下這個東西到哪裡去了？後來經過調查後，說是國防部史政局已經把它送到了臺灣，他才放心下來。雖然戰史到了臺灣，但是戰史編纂委員會編纂戰史的資料並沒有來臺灣，而是留在了中國大陸。這部分也就成為今天中國大陸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關於戰史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檔案。全宗號應該是 787，

做戰史研究的同好大概都會知道。

過去中國大陸對於這個部分也做過一些整理。他們把一些相對來講，認為比較重要的資料編輯出版《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中、下 3 冊。由於有這些東西的保存，所以我們今天再來看這個抗日戰爭相關問題，可以回到原來的資料裡面看。可是另外一方面，因為臺灣保有抗日戰史初稿，所以到了 1960 年代，在蔣中正總統的指示之下，同意把抗日戰史稿整編、出版，就在 1966 年就出版了這個抗日戰史，加上總目錄 1 冊，總共是 101 冊，這個是我們目前來講最完整的一個抗日戰史。抗日戰史出版後，由於抗戰史編纂過程當中，經過了一些整編，有不少對於戰史有研究的人對於內容是有意見的。

我對這個問題就很有興趣，就設法查了當時戰史編纂委員會的會議紀錄跟檔案，了解他們如何去編戰史。其實這部分也很有趣，它的檔案分別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臺北的檔案管理局各存一半。大概 1946 年之前的會議紀錄存放在中國大陸，1946 年之後的會議記錄是在臺灣。從歷次的會議記錄裡面就可以發現，一開始就把境外作戰的兩次緬戰納入到抗日戰史裡。而抗日戰史在整個編纂的過程中，當時參與編纂的人基本上都是上校以上的軍官，本身有非常強的作戰經驗，所以對於底下送上來的戰報基本上都會一一核實。甚至對於裡面所牽涉到的作戰人數也都會提出疑問，整個戰史在編纂

的過程中是非常仔細的。如果我們還原當時編纂戰史的過程，就會知道因為有這些前輩的苦心付出，我們今天才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抗日戰史。進而在抗日戰史基礎上，再針對大大小小戰役做更精細的研究，比如仁安羌作戰、中國遠征軍戰爭等，這是我們這邊所擁有非常重要的資產。我在過去幾年裡面，大概從 2015 年，也就是抗戰勝利 70 週年開始，一直建議軍方應該把抗日戰史數位化。然後，把這個抗日戰史放在網站上提供有興趣的研究者自由下載。因為這個東西雖然有人對它有意見，但它仍然到今天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抗日戰史的依據。

我在參與整個遠征軍研究計畫裡，感受最深的就是資料的重要性。因此我也想如果今後我們這個計劃還要繼續延續，如何在現有已經掌握的資料上面，能夠進一步的發展？比如說成立一個資料庫，讓更多有興趣從事戰史研究的朋友，能夠很方便的查找，畢竟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花費相當大的時間，甚至包括英國、美國、日本各方面的資料都收集在這個地方，有一個資料庫讓有興趣的研究者去查詢。我相信不管是對於中國遠征軍，甚至對整個抗日戰爭的研究會有更大的突破。以上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提出來請大家參考，謝謝。

藍適齊：

謝謝劉維開老師，我想剛剛 3 位座談會的講者，都從史料彙編、

軍事史，以及前面幾位老師提到的國際視角，讓我們更進一步的思考中國遠征軍的歷史意義。今天真的非常難得，我想就如幾位老師所說的，事實上這個研究計畫執行了 5 年，我們還很希望能夠有未來更多的開展跟開創性。今天特別高興的是，在座有很多位年輕學者來參加。事實上，這個研究計劃中，我們也看到研究所的學生參與撰寫了部分的研究成果，這就是歷史研究能夠繼續推動的最大鼓勵。今天也很感謝各位在座的嘉賓們，從早上到現在一直在這邊聆聽。今天非常的難得，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榮幸能夠在我們座談會結束之前，請馬總統再給我們一些指教，也給我們一些這個未來的期許，謝謝。

馬英九：

沒有想到你看出了我的心願了，因為你不叫我，我也會舉手。

藍適齊：

我有看到您一直在寫筆記，這個是我非常敬佩的地方。

馬英九：

首先，我要趁馬英九基金會董事長的身分，感謝政大人文中心舉辦了這樣一場有意義的討論會；我也贊成二位主任都希望這個研究能夠繼續，我們繼續從各方面找資源。我記得在 2015 年，紀念抗

戰勝利 70 週年時，習近平先生曾經表示過，希望兩岸共享史料、共寫史書。我當場立刻回應，我們非常贊成，但是希望不要有禁區，不要說哪些東西不能研究，然後大家能夠開創史料。剛剛我聽各位專家對這方面表示已經有一些成果，但還有很多可以繼續再努力的地方。譬如說，最近我看到郭岱君也常有一些研究出來。我想現在民間做的研究，我們可以透過各種方式把它結合起來，因為這些資料都是中華民國很重要的歷史。

另外，我想要講到剛才前一場討論到，外國對於仁安羌作戰的看法，我心裡充滿了感慨。因為一方面包括英緬軍第 1 軍長斯利姆，還有亞歷山大在回憶錄裡面講了一些讓我們非常驚訝的話，一方面說他們是自己逃出來的，遠征軍好像沒有幫什麼忙，又說中國還沒打贏過日本人一次，這些都讓我非常的驚訝。看得出來他們雖然跟我們合作，但其實看不太起我們，對於我們的幫忙也不是那麼感謝。可是不見得每一個英國人都跟他一樣，英國退役上尉費茲派翠克就很明顯地不同意這個看法，所以我們也不要因為有這兩個人的意見，就懷疑我們當初做錯了，或認為我們當時不該去馳援。

在這當中我也想到跟英國人打交道的一些過程，在珍珠港事變前，羅斯福總統就已經同意要讓飛虎隊來華助戰，那時美國還沒有正式成立空軍，用的就是民間人士，由海軍、陸軍陸戰隊的飛行員

來參加。當時也還沒有租借法案，表面上他們是以個人身份過來的，可是對我們非常重要，從 1941 年到 1942 年為止，飛虎隊就擊毀了 297 架日機，當時我們初步估計，每擊落 1 架日機，中國人民就少死 100 人，所以我對他們始終非常感謝。但美國人為什麼會把自己開發出來的 P-40 驅逐機送給我們？原因是英國人不要，英國本來跟德國打仗時，德國的戰鬥機是 BF-109，英國人覺得他們的飛機比德國戰鬥機好，看到 P-40 驅逐機的時候不滿意，覺得不如英國的 Spitfire 噴火式戰鬥機，希望美國人再發展，後來美國發展出 P-51 的時候，他們滿意了，但那已經很晚了。所以就把 P-40 送給我們了。那時候，中國的空軍簡直甚麼東西都沒有，能夠有 99 架（實際是送 100 架，運送時弄壞 1 架）P-40，變成我們把領空找回來的一個重要依據，否則，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這是我一個很深刻的感觸。有了這 99 架飛機，讓我們真正的成為我們領空的主人，使得日本人沒有辦法再越雷池一步。

講到英國人在二戰時對我們的一些態度，《開羅宣言》要通過時，我們派去的代表是王寵惠，英國則派出外交部次長賈德幹（Alexander Cadogan）。我們要求在《開羅宣言》中要寫到：「使日本竊自中國之領土，如東北、臺灣、澎湖等歸還中華民國。」這也是後來的文字，但賈德幹當時和王寵惠說不必寫那麼詳細，只要寫放棄就好了。王寵惠就說：「怎麼可以呢？當年日本人佔據東北

後成立偽滿洲國，如果我們不趕快講清楚，外界不知道怎麼回事。」這二人大吵起來，直到後來美國派出的代表——美國駐蘇聯大使威廉·埃夫里爾·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支持我們，所以後來的文字完全照我們的，各位想想《開羅宣言》的文字，現在要去草擬也草擬不出來這麼支持我們的語言，我剛剛也講了，他用「日本『竊自』中華民國的領土」，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我們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建議不稱「日本」，而是要稱「日據時期」（Japan Occupation）。《開羅宣言》基本上是一個條約，在日本、美國的條約集裡都有列入，是我們在外交上很大的勝利。

可是，老蔣總統從開羅回到中國前，他檢討，在外交上我們爭取到了澎湖、臺灣，但軍事上，《開羅宣言》、開羅會議，英國也沒有答應反攻緬甸。實際上，英國其實並不希望中國能夠得到好處。明朝鄭和下西洋時，所到之處常常是「興滅國，繼絕世」會去幫助那些被滅的國家和快斷絕的朝代，但從不會有任何領土上的野心。中國幅員遼闊，並不像歐洲人在所到之處稱王，採取的是睦鄰政策，曾將麻六甲王朝納入朝貢體系，當葡萄牙勢力侵略時，中國也給予庇護。當時的明朝作為地區領袖有很好的印象，而英國則是曾經切斷滇緬公路，造成我們很大的困擾，仁安羌之役中不僅是幫助了英國，也幫助了孤立的我們，十足展現了我們的實力與義氣。

像這樣的討論非常有意義，一方面交換意見，一方面讓年輕一代能夠了解中華民國的一貫立場，我們希望能變成國際社會的一個正面力量。努力不求報償是一個很好的態度，我們應該在談論這些問題時多強調。今天，我很高興能以馬英九基金會的立場跟政大合辦這個活動，我自己是獲益良多，因為我在研究國際法時，也不能忽略歷史，再次謝謝各位幫忙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我也會繼續努力幫助大家。

藍適齊：

真的非常感謝馬前總統給我們的期許與鼓勵。我要再感謝在線上的劉偉民先生，這麼多年來，對這個歷史議題以及我們推動的研究計畫，給予了無限的、持續的支持。最後，也要感謝在座、線上參與的聽眾，我們非常希望這是下一個階段的開始，未來我們還有更多可以跟各位分享，也請各位來參與我們的研究計畫，讓歷史能夠有更清楚的輪廓。

第一場次

《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之價值與應用
& 仁安羌作戰在中國軍事史的意義

《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之價值與運用

楊維真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

前言

歷史研究係奠基於詳實史料之基礎上，故史家研究歷史、撰寫史書往往須如史學前輩傅斯年（1896-1950）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¹一般，廣蒐博引相關史料。抗日戰爭耗時 8 年（1937-1945），戰局廣及大半個中國，戰爭損害巨大，影響深遠。對於此一重大史事，兩岸檔案機構如臺灣方面的國史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及大陸方面的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大陸各省市檔案館，均典藏抗戰史料甚多，學界也逐漸重視抗戰史相關研究。但關於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的相關研究卻受限於若干因素，譬如遠征軍赴緬甸作戰，脫離原中國戰區軍事委員會指揮，改列盟軍東南亞戰區作戰序列，造成指揮體系不一；而境外作戰（尤其是第一次緬甸作戰中國遠征軍敗績），相關檔案史料保存不易；而中國遠征緬甸之參戰將領，後來或於國共內戰時

1 1928 年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宣示：「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該文後來收入《傅斯年全集》，第 4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頁 264。

陷共（如原中國遠征軍第 5 軍軍長杜聿明〔1904-1981〕、遠征軍新編第 22 師師長廖耀湘〔1906-1968〕等），或於 1949 年來臺後捲入政治案件（遠征軍新編第 38 師師長孫立人〔1900-1990〕），遂使彼等早年于役緬、印之戰績隱而不彰。也因為這些因素的限制，以致過去相關研究頗為有限，遂有較大的開拓空間。

及至 1990 年以後，隨著臺灣政治解嚴及兩岸情勢和緩，相關檔案機構陸續整理刊布中國遠征軍檔案史料。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典藏相關軍事、作戰檔案甚為豐富，早在前身史政局時代，即已整理刊布相關檔案，按戰局發展出版《抗日戰史》² 系列叢書，其中與入緬作戰相關的是《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1982）³ 一書；1999 年該局將經多年訪談紀錄、整理校正之遠征軍參戰官兵訪談紀錄《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⁴ 正式出版，嘉惠學界相關研究。此外，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另行翻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的《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其中與第一次緬甸作戰相關的是《緬甸攻略作戰》（1997）⁵ 一書，對於 1942 年日軍攻略緬甸有詳實的紀載。由於

2 國防部史政局編，《抗日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6 年）。

3 國防部史政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局編譯局，1982 年再版）。

4 邱中岳等訪問、王紫雲等紀錄，《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 年），頁 40。該書全套 3 冊，分為：（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下冊）；（二）一個老兵的親身經歷與畢生研究，乃邱中岳（1919-2009）將軍之緬戰回憶錄，邱將軍曾任中國遠征軍新編第 22 師上尉連長，親身參與入緬作戰。由於《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全書均為參戰官兵之訪談回憶，尤其偏重於中下級基層軍官，對於了解緬戰細節助益頗大。

5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曾清貴譯，《緬甸攻略作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44），（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年）。

該局經歷次整編降階，已無足夠人力、物力典藏相關檔案，現乃將大陸時期軍事檔案轉移至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史館相關典藏中，擁有大量遠征軍檔案，已於 2015 年從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及《陳誠副總統文物》中彙整與遠征軍相關之重要史料，出版《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⁶ 一書。至於大陸方面，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自成立伊始，由於地利之便，接收先前國民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各部會相關重要檔案，故典藏甚多民國史檔案，乃民國史檔案之重鎮；近年該館除陸續就其典藏檔案文獻進行數位化外，更整理選編重要檔案出版。2019 年，二檔館選編該館所藏國民政府《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中相關檔案史料，出版 3 卷本、115 萬餘字之《滇緬抗戰檔案》⁷ 套書。這些大體上已呈現兩岸檔案機構關於中國遠征軍檔案史料的相關出版概況。

《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的出版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成立於 2008 年，其主要任務之一即為「進行民國史檔案資料數位化工作，建置中國近現代史資料庫」，對於蒐集整理、研究出版民國史相關檔案不遺餘力。⁸ 自 2017 年起，政大人文中心積極推動中國遠征軍研究，在周惠民前主任的擘畫下，籌

6 周琇環、吳淑鳳、蕭李居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臺北：國史館，2015 年）。

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滇緬抗戰檔案》，上中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 年）。

8 「中心簡介」，政大人文中心：hc.nccu.edu.tw。（2022 年 4 月 12 日點閱）

組研究團隊，執行「中國遠征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多年期研究計畫，藉由中國於二次大戰期間派出國軍前往緬甸，與同盟國軍協同作戰的過程，探討其在政治、社會、經濟、外交與文化、族群等層面產生的影響。「中國遠征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計畫的工作重點有二：一為徵集、交換遠征軍相關檔案資料；另一則為舉辦工作坊、研討會，籌備出版專書，推進遠征軍研究，現均已陸續呈現其成果。

在徵集遠征軍資料方面，政大人文中心成立後，經由曾任中國遠征軍第一任司令長官、前副總統陳誠（1898-1965）長子陳履安、女婿余傳韜捐贈《陳誠副總統文物》的數位檔案資料，遂成為該中心重要珍藏。在此基礎上，政大人文中心並陸續徵集其他檔案，致力充實中心所藏中國遠征軍檔案史料；另與國史館、國發會檔案管理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等檔案館進行館際合作、交流，共同推動相關檔案資源分享。

在推進遠征軍研究方面，「中國遠征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團隊認為中國遠征軍跨境出擊，不僅牽涉同盟國軍事行動的協調，涉及盟軍東南亞戰區範圍內緬甸、印度等英屬殖民地，中國於戰後扶持亞洲各國獨立與英國欲鞏固其殖民統治的不同立場，更增問題之複雜。故遠征軍入緬作戰既是國際合作，卻也暗潮洶湧。於是，

研究團隊重新檢視遠征軍相關議題，並從太平洋戰爭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角度，微觀與宏觀並舉，重新檢討遠征軍入緬作戰的意義與影響。經多年努力，並在籌辦多次工作坊、研討會的基礎上，研究團隊各分組已分別撰就相關專書陸續出版。政大人文中心將研究團隊的成果集結為「中國遠征軍系列叢書」，規劃出版專書 9 冊、檔案史料彙編 2 冊。在專書出版方面，現已出版李君山教授的《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⁹、王文隆教授主編的《中國遠征軍與國際關係》¹⁰、邵銘煌教授主編的《緬北反攻影像史記》¹¹，以及周惠民教授主編的《檔案中的中國遠征軍》¹²，本人主編的《指揮、後勤與地方政治》¹³一書亦已付梓。而關於檔案史料彙編的出版，則與下文所述劉偉民先生主編的《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¹⁴的成書息息相關。

為推進中國遠征軍相關研究，政大人文中心決定先就遠征軍第一次緬甸作戰時所創下的傑出戰果——「仁安羌作戰」一役，選編相關檔案史料予以彙集出版。經多方廣蒐博集，先後從國史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9 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臺北：政大出版社，2021 年）。

10 王文隆主編，《中國遠征軍與國際關係》（臺北：政大出版社，2021 年）。

11 邵銘煌主編，《緬北反攻影像史記》（臺北：政大出版社，2021 年）。

12 周惠民主編，《檔案中的中國遠征軍》（臺北：政大出版社，2022 年）。

13 楊維真主編，《指揮、後勤與地方政治》（臺北：政大出版社，2021 年）。

14 劉偉民主編，《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臺北：政大出版社，2022 年）。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德國聯邦檔案館（Das Bundesarchiv）等國內外檔案館中，徵集、蒐錄近百件檔案資料，經授權後輯錄而成《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一書。此外，本書主編，也是指揮所部創下仁安羌勝利戰果的新 38 師第 113 團團長劉放吾（1898-1994）將軍之子劉偉民，慨然提供其父日記、回憶錄及其個人多年收藏仁安羌作戰相關文物，加上該彙編也蒐羅了關於仁安羌一役的中外報刊報導，更豐富《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一書的內容。政大人文中心出版該彙編的用意，是希望能還原仁安羌作戰的歷史現場，讓讀者認識當年緬戰實況及敵、我兩軍對陣情勢。¹⁵

價值與運用

仁安羌作戰是中國遠征軍在 1942 年第一次緬甸作戰中的重要勝利，除與盟軍協同作戰外，更開創以少勝多、解救大量英軍及盟國軍民的先例，彰顯國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東亞戰場的貢獻與價值。此役作戰過程雖僅數日（4 月 17 日劉放吾團長奉命率部抵仁安羌地區，18 日拂曉發動攻擊，19 日擊敗日軍、克復仁安羌油田區，解救被圍之英緬軍官兵），但因相關檔案史料頗為有限，中、英方相關記載差異頗大，如統一指揮仁安羌聯盟作戰的英軍第 1 軍團長斯利

15 〈說明〉，收入劉偉民主編，《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頁 v-ix。

姆（William J. Slim，1891-1970），於二戰後出版緬戰回憶錄《反敗為勝》（Defeat into Victory），在記載仁安羌作戰時，即指國軍未按時發起攻擊，以營造英軍自行突圍的假象。緬甸戰區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 1891-1969）上將的回憶錄稱：「中國軍隊從未贏得過一次對日作戰」，也記載不實。¹⁶ 加以此役又牽涉到究竟是新 38 師師長孫立人（1900-1990），抑或是新 38 師第 113 團團長劉放吾指揮作戰主力——新 38 師第 113 團等問題，遂引發相當之爭議。¹⁷ 近年來軍方退役將領張鑄勳將軍、何世同將軍，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泐源教授等，或從軍中指揮、作戰系統切入，或至仁安羌現地查考，或著眼於國際政治，均對此役有新的觀點與詮釋，豐富了仁安羌作戰的相關研究。¹⁸ 而《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一書的出版，則將對仁安羌作戰，甚至關於中國遠征軍第一次緬戰的研究續添薪火。

16 張鑄勳，〈再探中國遠征軍〈仁安羌戰鬥詳報〉暨第 113 團替英軍解圍〉，收入張鑄勳主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作戰》（臺北：政大出版社，出版中），第三章。

17 仁安羌作戰結束後，由新 38 師司令部編撰的〈第一次燕南羌戰鬥詳報〉本應為最權威的第一手史料，但因該〈戰鬥詳報〉聚焦於孫立人師長指揮，未見劉放吾團長作為，所載難言客觀。詳見〈第一次燕南羌戰鬥詳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滇緬抗戰檔案》，上冊，頁 230-237。「燕南羌」即仁安羌之舊譯。

18 張鑄勳，〈仁安羌大捷戰場巡禮：國軍 113 團揚譽國際的作戰〉，《中華戰略學刊》，102 年夏季刊（2013 年 6 月），頁 265-325；〈中國遠征軍「仁安羌戰鬥詳報」的考證：兼論國軍第一一三團替英軍解圍〉，收入阮大仁、傅應川、張鑄勳、周珞合著，《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9 年），頁 165-209；〈再探中國遠征軍〈仁安羌戰鬥詳報〉暨第 113 團替英軍解圍〉（待刊）；何世同，〈1942 年「仁安羌之戰」始末〉，《國防雜誌》，第 32 卷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1-48；朱泐源、蕭明禮、楊力明，〈從國際政治重建中國遠征軍仁安羌之役〉（未刊）。

《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一書共選錄 116 件相關檔案、史料、文物及報導，依性質及時間先後順序，分為入緬背景、戰鬥經過、戰後檢討、重回戰場等四大主題及相關報導，呈現仁安羌作戰之完整態勢。尤其第二部分「戰鬥經過」及第三部分「戰後檢討」的檔案史料，對於仁安羌之役相關研究及指揮權爭論平議助益甚大。在第二部分「戰鬥經過」中，〈第一次仁安羌戰鬥詳報〉、〈新編第 38 師第 113 團賓河之役俘獲物品數量呈報表〉二份資料；第三部分「戰後檢討」中，〈羅卓英電蔣中正報告劉放吾團在仁安羌救出被圍英緬軍請給予獎勵〉、〈蔣中正電史迪威等有關第 113 團克復仁安羌詳報陣亡官兵以憑敘勳〉等二件資料，均對作戰實況及由劉放吾團長直接指揮第 113 團出擊作戰有頗為清楚的記載。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出版的《滇緬抗戰檔案》套書，雖亦完整收錄新 38 師入緬作戰歷次作戰詳報（包含註 17 所述〈第一次燕南羌戰鬥詳報〉），但關於〈俘獲物品數量呈報表〉、〈死傷表〉等附件資料則未收錄，這毋寧是一大缺憾。而《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則擇要收錄這些附件資料，可謂彌補此一缺憾。除了徵集相關檔案史料外，尤為難得的是《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一書還收錄新 38 師第 113 團劉放吾團長的日記、回憶錄等資料，包括〈劉放吾撰「仁安羌」痛殲日寇記：最光榮的一團，最後離出戰場〉、〈劉放吾日記追憶仁安羌作戰內容〉、〈劉放吾上孫立人陳情書〉等，

除更能釐清劉放吾團長直接指揮所部參戰外，益增該書內容的豐富與徵信。

結語

1942年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是民國以來國軍首度出國作戰，同時也是中國軍隊與英、美盟軍並肩作戰，更加彰顯中國對二戰東亞戰場的重要性。仁安羌作戰則是遠征軍入緬後第一場勝仗，擊敗數倍於己的敵軍，獲致解救盟國軍民的重要戰果。《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一書的出版，不僅彰顯國軍域外作戰艱苦卓絕之精神與成就，詳實記載仁安羌作戰之來龍去脈，也對推動中國遠征軍研究，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助益甚大。

仁安羌作戰在中國軍事史的意義

楊維真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

前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攻勢凌厲，除橫掃東南亞各地外，日本第15軍司令官飯田祥二郎（1888-1980）以第18、第33、第55、第56等4個師團及特種部隊10餘萬之眾，集結泰國邊境，於1942年1月大舉入侵緬甸。¹此舉不但嚴重威脅印度安危，並可截斷中國西南重要國際交通線——滇緬公路。因此，在英、美力請下，中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盟軍中國戰區統帥蔣中正（1887-1975）決定編組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並委美軍將領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 1883-1946）以中國戰區參謀長身分兼遠征軍總指揮，揭開第一次緬甸作戰的序幕。軍事委員會隨即編組中國遠征軍第1路軍（下轄第5軍、第6軍及第66軍，尤以中央軍勁旅第5軍擁有機械化部隊，最稱精練）入緬作戰，由衛立煌（1897-1960）任司令長官（衛氏未到任，由副司令長官兼第5軍軍長杜聿明〔1904-1981〕代

1 梁敬錚，《史迪威事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第3版），頁40。按梁書原文日軍作戰序列為第18、第23、第55、第58等4個師團，與史實略有出入，今據其他資料修訂之。

理），後由羅卓英（1896-1961）繼任遠征軍第1路軍司令長官。²1942年第一次緬甸作戰失利，史迪威、羅卓英率總部人員退入印度，中國遠征軍除一部輾轉撤入印度外，大部均撤回國境，轉進怒江東岸，隔江與日軍成對峙狀態。此役中國遠征軍雖敗績而歸，但所部第66軍新編第38師卻在仁安羌作戰立下輝煌戰績，該師第113團在英軍戰車隊及火炮協同作戰下，擊敗數倍日軍，解救受困於仁安羌油田區的英緬軍第1師官兵及盟國軍民，創造所謂的「仁安羌大捷」³。

但此役長期以來受限於若干因素，譬如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係屬於域外作戰，脫離原中國戰區軍事委員會指揮，改列盟軍東南亞戰區作戰序列，造成指揮體系不一；遠征軍赴境外作戰，尤其在第一次緬戰中國遠征軍敗績，所部於撤退途中傷亡慘重，相關檔案史料保存不易；而新38師師長孫立人（1900-1990）於1949年來臺後捲入政治案件，部屬或遭牽連判刑羈押，或被迫退役星散，遂使該師早年所創仁安羌之戰績被隱沒。加上中、英方對此役的相關記載差異頗大，如統一指揮仁安羌聯盟作戰的英緬軍第1軍團長斯利姆（William J. Slim，1891-1970），於二戰後出版其關於緬戰回憶錄《反

2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收入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69。

3 張鑄勳，〈仁安羌大捷戰場巡禮：國軍113團揚譽國際的作戰〉，《中華戰略學刊》，102年夏季刊（2013年6月），頁265-325。後增補收入《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週年論文集》（臺北：國防大學，2014年）；何世同，〈1942年「仁安羌之戰」始末〉，《國防雜誌》，第32卷第2期（2017年6月），頁1-48。

敗為勝》（Defeat into Victory），在記載仁安羌作戰時，即指國軍未按時發起攻擊，以營造英軍自行突圍的假象；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 1891-1969）上將的回憶錄則稱：「中國軍隊從未贏得過一次對日作戰」，也屬記載不實。⁴緣此種種，以致過去仁安羌作戰相關研究頗為有限，其在中國軍事史上的意義未能彰顯。今則根據若干史料，重新檢視之。

國軍首次出國作戰

1942年3月起，中國遠征軍所部杜聿明第5軍、甘麗初（1901-1950）第6軍及張軫（1894-1981）第66軍，並有工兵團、裝甲兵團、炮兵團、汽車兵團、騎兵團、輜重兵團等部隊，總計約10萬兵力，開始假道雲南，分途入緬援英。⁵這是民國以來，國軍第一次出國作戰，軍事委員會軍政部為鼓舞軍心士氣，於3個月內運用一切資源，動員昆明所有服裝工廠趕製10萬套軍服，以壯行色；中國遠征軍換上新裝入緬，部隊士氣高昂。⁶當日青年學生報國情殷，遠征軍出征

4 張鑄勳，〈再探中國遠征軍〈仁安羌戰鬥詳報〉暨第113團替英軍解圍〉，收入張鑄勳主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作戰》（臺北：政大出版社，出版中），第三章。

5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附錄：緬甸作戰經過〉，頁333-334。

6 〈李先庚將軍訪問紀錄〉，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暨回憶記錄》，下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頁213。口述者李先庚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昆明行營兵站總監部少將經理處長，後來兼任中國戰區盟軍統帥後勤部經理處長。

大軍途經雲南出國時，即有許多雲南青年學生從軍入伍。如杜聿明第5軍於入緬前，該軍政治部駐昆明以東的楊林鎮，為了入緬援英，遂行政治作戰與宣慰僑胞，乃於昆明招考男女青年組成政工隊，後來錄取43人，大多是昆華女中及藝專的師生，如王雲清與吳小苑是昆華女中的學生，人稱「高老師」的高淑梅則是小學老師。⁷不久，第5軍軍部進駐滇西下關，為了執行入緬作戰的特殊任務，又招考就讀於保山中學的緬甸華僑男女學生94人，經短期集訓後，男生分發第5軍所屬各部隊擔任隨軍翻譯，女生仍留政工隊協助宣慰僑胞。⁸及至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後，所到之處均受到華僑的熱情招待，當國軍車隊進入緬甸時，華僑夾道歡迎，投送慰問品。在餐廳進食，老闆不肯收錢；購買用品，商家免費贈送。⁹足見中國遠征軍入緬之初，受僑胞熱誠歡迎的盛況。

惟中國遠征軍未及全部開入緬甸，其首都仰光（Rangoon）已於1942年3月8日陷落，日軍並繼續向北進攻，一路追奔逐北。此際，

7 〈李明華上尉訪問紀錄〉，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暨回憶記錄》，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頁194。口述者李明華乃抗戰女兵，時任第5軍政治部第1科上尉幹事。

8 〈李明華上尉訪問紀錄〉，頁194。另見李明華，〈野人山歷劫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55-56。

9 〈夏志忠將軍訪問紀錄〉，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暨回憶記錄》，上冊，頁213。口述者夏志忠時任第5軍通信營少校營附兼無線電連連長，親與緬戰。

緬甸戰事日趨險惡，英緬軍隊士無戰志，甚至有放棄緬甸、確保印度的打算；而在緬盟軍因無統一指揮，以致缺乏聯繫協作，陷入各自為戰的窘境。是以中國遠征軍入緬後，雖於緬北各要地實施逐次抵抗，但大局已不可為。¹⁰更嚴重的是，日軍為斷中、英軍歸路，竟以第 33 師團、第 56 師團為左、右兩翼兵團，分道迂迴緬北，意圖對盟軍實施戰略大包圍，對當日戰局造成極大威脅。¹¹

日軍第 33 師團長櫻井省三（桜井省三，1889-1985）為擊滅撤退中的英緬軍第 1 師，將所轄 3 個步兵聯隊各增配山砲、工兵、高射砲、速射砲、輕裝甲車隊、衛生隊等，編成可以獨立執行任務的聯合兵種特遣隊。「作間部隊」以第 214 聯隊編成，聯隊長作間喬宜（1894-1966）大佐。「原田部隊」以第 215 聯隊編成，聯隊長原田棟（1893-1982）大佐。「荒木部隊」以第 213 聯隊編成，指揮官為第 33 步兵團長荒木正二（1892-1970）少將。第 33 師團探聽到英軍退卻，立刻兵分三路實施追擊，其作戰構想為派遣有力之一部實施遠程挺進，先截斷英軍退路。主力從英軍背後追趕，南北夾擊全殲英緬第 1 師。兵力部署以作間部隊為「超越追擊部隊」，採取快速機動繞越英軍斷其退路。原田及荒木兩部為「直接追擊部隊」，

10 中國遠征軍在緬逐次抵抗日軍情形，可參見張家德，《中國抗日遠征史，第 1 卷：保衛滇緬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72-406。

11 邱中岳編撰、陳鴻獻整理，〈抗戰時期滇緬作戰經過〉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戰時期滇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暨回憶記錄》，上冊，頁 18。

緊隨英緬第 1 師實施陸、空攻擊，強力拘束其行動，以利作間部隊超越攔截。¹²

此際英軍士氣低落，幾無戰志，在日軍到達前或與其一接觸，英軍即向後撤離。1942 年 4 月 5 日，英軍棄守阿蘭廟（Allanmyo），沿伊洛瓦底江縱谷北撤，日軍尾隨北進。4 月 16 日，英緬軍第 1 軍團撤至歸約（Gwegyo），英緬軍第 1 師退守仁安羌（Yenangyaung），英印軍第 17 師及英裝甲第 7 旅退守東敦枝（Taungdwingyi）、納特曼克（Natmauk）。16 日夜，日軍「作間部隊」（即第 33 師團第 214 聯隊）攻陷仁安羌，包圍英緬軍第 1 師主力於仁安羌東北油田區。¹³ 就在此時，中國軍隊奉命增援，展開仁安羌作戰之序幕。

協同盟軍作戰成功案例

仁安羌作戰是中國遠征軍在 1942 年第一次緬戰中的重要勝利，此役作戰過程雖僅數日，但因參戰國軍新 38 師第 113 團受英軍指揮，在英軍戰車隊及火炮支援下，開創了協同盟軍作戰，並且以少勝多、解救大量英軍及盟國軍民的先例，更加彰顯國軍在二戰東亞戰場的貢獻與價值。整體而言，在國軍第一次入緬作戰期間，由於指揮體

1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曾清貴譯，《緬甸攻略作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44），（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年），頁 502-512。

13 邱中岳編撰、陳鴻獻整理，〈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經過〉，頁 16-17。

系分歧、語言不通、部隊文化差異等因素，中國遠征軍與盟軍的協同作戰狀況並不佳，這也是遠征軍入緬敗績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仁安羌作戰則是一次成功的協同作戰，國軍步兵一團兵力（新 38 師第 113 團），搭配英軍戰車隊及火炮，成功逆襲日軍，完成解救英軍之重要作戰目標。¹⁴

先是 1942 年 4 月 14 日晨，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以英軍在仁安羌被圍，處境十分艱危，急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請求中國軍隊增援。遠征軍司令長官羅卓英乃急命第 66 軍新 38 師（該師入緬後為中國遠征軍總預備隊，接替英軍守備緬甸中部重鎮曼德勒〔Mandalay〕，新 38 師師長孫立人任曼德勒衛戍司令），¹⁵ 派第 113 團兼程馳援。17 日，第 113 團團長劉放吾急率該團抵喬克巴唐（Kyaukpadaung），英緬軍軍團長斯利姆聽聞第 113 團已抵達，即乘車趕抵喬克巴唐面晤劉放吾，聲稱該團已歸其指揮，令劉放吾率部替英軍解圍。斯利姆當即下達手令：「致 113 團團長劉上校：茲派貴官率領貴團全部，乘汽車至賓河〔Pinchaung River，亦譯「拼牆河」、「平牆河」〕地區，在該處，你將與安提斯〔John H. Anstice, 1897-1970〕准將會合，他將以所有戰車支援你的部隊。你的任務是

14 張鑄勳，〈中國遠征軍「仁安羌戰鬥詳報」的考證：兼論國軍第一一三團替英軍解圍〉，收入阮大仁、傅應川、張鑄勳、周珞合著，《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9 年），頁 165-209。

1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年，再版），頁 49。

攻擊並消滅賓河北岸約兩英里公路兩側之敵。」¹⁶ 斯利姆準備車運第 113 團官兵至賓河地區，會合英軍戰車隊，攻擊並消滅賓河北岸日軍。劉放吾團長堅持此命令須得到新 38 師孫立人師長同意，及至以無線電與孫立人聯繫確定後，立即奉命執行。¹⁷

18 日晨，孫立人將軍亦從曼德勒駐地趕抵仁安羌前線督導。18 日拂曉，第 113 團在團長劉放吾指揮下，在英軍戰車隊 12 輛輕戰車（1 個戰車連）及 3 門重炮（約 1 個砲兵連）的支援下，對賓河日軍發動攻擊。¹⁸ 由於當時國軍步兵團未曾接受過步戰砲協同作戰訓練，更沒有協同作戰經驗，第 113 團臨陣與日軍對戰，步戰砲協同作戰之戰術、技術、後勤、編組與運用等專業，均非短時間所能訓練速成。要解決這些問題，在作戰實務上，英軍必須選派幹部編成「支援組」輔導部隊執行任務，在戰前協助中英雙方完成步戰砲相互搭配的戰鬥編組、策訂協同作戰計畫及實施臨戰訓練等；並於開戰後則隨同部隊前進，在專業、技術及後勤上輔導部隊發揮協同戰力。¹⁹ 此任務須以得力幹部專司其職，英軍裝甲第 7 旅旅長安提斯准將是專家，足以勝任，故斯利姆下達之手令才要劉放吾與安提斯會合，「他〔按：指安提斯〕將以所有戰車支援你的部隊」。²⁰ 在英軍輕戰

16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香港：今日出版社，2007 年，4 版），頁 22。

17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 23。

1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 68。

19 張鑄勳，〈再探中國遠征軍〈仁安羌戰鬥詳報〉暨第 113 團替英軍解圍〉（待刊）。

20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 22。

車與火炮協同作戰下，第 113 團順利渡過賓河攻抵南岸，在與日軍反復廝殺爭奪後，於 19 日克復仁安羌油田區，救出英緬軍第 1 師 7 千餘人，英美傳教士、新聞記者等 5 百餘人，各式車輛百餘輛。²¹ 這是一次成功的盟軍協同作戰，堪為中國軍事史之戰例。

以少敵多、以少勝多

仁安羌之役，係因英緬軍第 1 師北撤期間，被日軍「作間部隊」（即第 33 師團第 214 聯隊配屬山炮兵第 3 大隊）截斷退路，困守仁安羌，國軍新 38 師第 113 團奉命增援，以解救被圍困的此部英軍。新 38 師第 113 團兵力雖號稱一團，編制有官兵 1,121 人，但因上級「空缺虛報」的原因，實際上兵力僅約 8 百餘人。²² 而對手日軍「作間部隊」則是除原有第 33 師團第 214 聯隊外，另配屬山炮兵第 3 大隊，總兵力近 4 千人，實力相當可觀。然而此役第 113 團將士用命，在團長劉放吾指揮下，協同英軍戰車隊、砲兵，不惜重大犧牲（此役第 113 團包括第 3 營營長張琦、連長顧紀常、劉竹秋、莊陶等共 202

21 邱中岳編撰，陳鴻獻整理，〈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經過〉，頁 18-19。按英方資料則稱，英緬軍趁中國軍隊打開日軍包圍缺口，撤出 4 千餘名官兵。

22 按〈第六十六軍新編第三十八師緬甸戰役戰鬥詳報〉記載，新 38 師第 113 團參戰官兵共 1,121 人，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滇緬抗戰檔案》，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 年），頁 225。但據第 113 團團長劉放吾回憶，實際 113 團參戰人員只有 8 百餘人，因上級空缺虛報的情形很普遍。參見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 40。亦見何世同，〈1942 年「仁安羌之戰」始末〉，頁 1-48。

名官兵陣亡，318 人受傷，傷亡人數合計共 520 人，已近全團編制兵力之半，超過實際參戰官兵 60%），²³ 成功擊敗圍困日軍，不僅解救 7 千餘名英軍，並有其他英、美傳教士、新聞記者及僑民獲救，創造國軍以少敵多、以少勝多之成功案例，獲致巨大的國際宣傳效益。

事實上，自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日軍橫掃東南亞，美、英、荷印一路敗退，東南亞盟軍士氣低落，悲觀氣氛瀰漫，緬甸戰局亦告不利。然而，盟軍在緬甸戰場首度勝利，於仁安羌擊敗數倍日軍者，竟然是被視為武器裝備最落後的中國軍隊，實令西方國家難以置信，報刊輿論乃將之視為傳奇。中國抗日戰爭長期不利，這場勝利振奮低迷許久的民心士氣，甚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亦寄望新 38 師第 113 團在仁安羌的勝利，能成為扭轉緬甸不利局面的契機。²⁴ 足見此役在中國軍事史上的重要意義。

23 「新編第 38 師仁安羌戰鬥詳報死傷表」（1942 年 4 月 24 日），收入劉偉民主編，《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臺北：政大出版社，2022 年），頁 327-328。

24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4 月 20 日。參見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臺北：國史館，2011 年），頁 835。

結語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兵鋒橫掃東南亞，盟軍一路潰敗。就在此際，國民政府於 1942 年初，將國軍精銳編組成中國遠征軍，並開赴緬甸與日軍作戰，這是近代以來國軍首度出國作戰，意義深遠。

第一次緬戰中國遠征軍雖告敗戰，但所部新 38 師第 113 團卻於仁安羌一役中，在英軍戰車隊、火炮隊的支援下，與英軍並肩作戰，首度發揮盟軍協同作戰之精神，並創造以少勝多的戰果，足堪列入中國軍事史之戰例。仁安羌作戰不僅展現中國遠征軍官兵驍勇善戰之精神，更彰顯中國對二戰東亞戰場的價值與重要性，值得大書特書。

第二場次

1942 年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的戰略構想與備戰部署 & 盟軍眼中的中國遠征軍：從英國檔案看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

1942 年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 戰略構想與備戰部署決策的折衝

王懷慶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上校教官

前言

1942 年 2 月中國遠征軍第一次緬甸作戰，抗日戰爭正式進入聯盟作戰階段。緬甸當時除了是英國的殖民地之外，更是中國抗戰的重要國際補給路線。為了確保補給線暢通，中國在英國的邀請下，派出國軍第 5 軍、第 6 軍及第 66 軍等精銳部隊入緬參與聯盟作戰。此外，不僅中英部隊，美國駐華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 1883-1946）將軍，也在 3 月初到任時，遣赴緬甸指揮遠征軍作戰。

關於此次作戰的討論，較多關注在作戰的過程，舉凡新 38 師第 113 團仁安羌解圍作戰、第 200 師同古作戰、平滿納跟曼德勒會戰的放棄，以及第 5 軍撤退時在野人山（Kachin Hills）的重大損傷。然而，對於這些軍事行動所依據的作戰計畫形成的過程，甚少有人去探究。也就是說，遠征軍作戰構想的發展與轉折以及備戰部署的過程，幾乎沒有受到關注。而這卻是第一次緬戰失敗且損失慘重最根源的原因。

遠征軍入緬的作戰構想，並非全程不變，而是隨著戰局發展而調整，主要分界在仰光（Rangoon）失陷前後。仰光失陷前遠征軍的備戰部署以第 5 軍主力配置在仰曼鐵路南段，便於機動可攻可守，保持彈性協力英軍作戰。仰光失陷後，中國經由緬甸出海的國際通道中斷，蔣中正（1887-1975）認為主力過度向南推進已無意義。遂調整於緬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地區實施會戰。但這個作戰構想，被史迪威嚴重抵制，因為後者堅持要在同古（Taungoo）與日軍決戰。史迪威抗命下的產物，也種下了遠征軍入緬作戰失敗的主因。茲將遠征軍在仰光失陷前後的戰略構想及兵力部署說明如次。

仰光失陷前

1941 年 12 月日本發動戰爭後的兩日，英國改變開戰前拒絕與中國軍事合作的立場，於 12 月 10 日主動請求國軍入緬作戰。¹ 同日，國民政府軍令部駐昆明參謀次長林蔚（1889-1955），也建議蔣中正應迅速調動雲南境內部隊入緬，以確保緬甸安全。² 囿於情勢的發展，蔣中正於 12 月 11 日同意將第 6 軍第 93 師開往滇緬邊境車里，並向

1 「蔣中正與戴尼斯談話紀錄：其代表英國政府請求中國派遣軍隊入緬協防等」（1941 年 12 月 10 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重要協商（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16-008。

2 「林蔚電蔣中正請移滇境軍隊入緬泰協助英軍對日軍作戰」（1941 年 12 月 10 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96-048。

泰緬邊境猛楊（Mong Yawan）前進，另第 49 師 1 個加強團開往緬北邊境畹町。³16 日，又令第 5 軍、第 6 軍主力向滇西邊境集結，準備入緬協力英軍作戰。⁴然而，當第 5、第 6 兩軍主力整裝待發時，英國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Archibald P. Wavell, 1883-1950）卻表示，已由印度調派部隊支援緬甸作戰，因此除第 93 師及第 49 師已進入緬境的部隊外，其餘國軍主力部隊停止入緬。⁵對於魏菲爾拒絕中國軍隊入緬的決定，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得知後甚為不解，認為基於同盟立場，英緬軍必須立刻接受中國軍隊支援緬甸作戰。⁶對於邱吉爾的指示，英緬軍總司令胡敦將軍（Thomas J. Hutton, 1890-1981）及英方代表哈蒲生上校，分別於 1942 年 1 月 23 日及 2 月 3 日再次要求國軍入緬作戰⁷。

遠征軍入緬後，是受英軍指揮及責任區的劃分，英軍陸續移於緬甸西部，概以仰光到曼德勒南北之線的西方主要地形為分界，以東

-
- 3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頁 48-49。
 - 4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年），頁 12。
 - 5 「蔣中正召集美英澳等國代表舉行第一次聯席軍事會議」（1941 年 12 月 23 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重要協商（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16-029。
 - 6 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著，吳萬沈等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四卷：命運的關鍵（1942 年至 1943 年 5 月）》（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頁 98。
 - 7 「作戰前之狀況」，〈滇緬路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1/152.2/2196.2/001/001/0012。

屬遠征軍（含仰曼鐵路）。以西由英軍負責，並編為第 1 軍團（軍級單位，轄英緬第 1 師、英印第 17 師及裝甲第 7 旅）擔任伊洛瓦底江方面的作戰。⁸ 此時，日軍第 15 軍主力部隊已經突破泰緬邊境，並於 1 月 31 日攻克毛淡棉機場。2 月上旬，日軍主力渡過薩爾溫江向西北方向進攻，並在 17 日下達作戰命令：軍以攻略仰光為目的，以第 33 師團在右，第 55 師團在左，擊滅當面英軍，進入西唐河畔。日軍在攻擊途中掃蕩所有西唐河以東約 2 至 3 千名英軍，並準備攻略仰光。⁹

雖然受到英軍決策反覆的拖延，蔣中正仍然在 1942 年 2 月 3 日令第 6 軍進駐泰緬邊境的景東地區，並歸英緬軍總司令胡敦指揮。¹⁰ 再於 2 月 14 日令第 5 軍按照第 200 師、第 96 師、新 22 師順序運輸入緬，並在同古、仰光間地區集中。¹¹ 至於遠征軍入緬後的位置，胡敦的部署如次：（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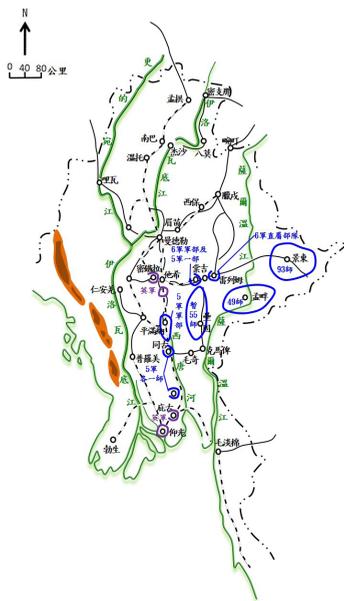
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年，再版），頁 1、21。

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曾清貴譯，《緬甸攻略作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44）（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年），頁 197。

10 「蔣中正電甘麗初該軍與九十三師四十九師暫五十五師開拔情形」（1942 年 2 月 3 日），〈遠征入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5-00006-039。

11 「蔣中正電龍雲林蔚俞飛鵬杜聿明等仰光情況緊張英代表團請派第五軍迅速入緬該軍由十六日開始汽車輸送向畹町集中應於二十日內輸送完畢等情」（1942 年 2 月 14 日），〈遠征入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5-00006-038。

英軍規畫遠征軍部署示意圖



▲ 圖 1 英軍規劃遠征軍部署示意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第一冊」（1942年9月30日），〈緬甸戰役得失評判（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72620-00001-001，插圖四。

令第 6 軍甘麗初（1901-1950）以 3 個師為第一線，在泰緬邊境長達 300 餘公里的範圍，以第 93 師位於景東、第 49 師位於孟畔、暫 55 師於壘固（羅衣考，Loikaw），負責對在泰國境內的日軍擔任第一線警戒任務。另外，第 5 軍則是負責擔任第二道防線，以 1 個師駐防棠吉（Taunggyi），擔任第 6 軍的預備隊；另外 2 個師則部署在同古與仰光之間，以填補第 6 軍從壘固以西至仰光間的防線空隙。第 5 軍另須掩護從南方撤退而來的英軍安全。此外，胡敦甚至不同

意國軍派遣連絡參謀分駐英方師、旅部，以建立聯盟作戰的基本條件，經再三交涉，只允在英緬軍第 1 師派 1 員¹²。

對於胡敦的部署，蔣中正深不以為然，認為英軍的處置與精神皆無作戰誠意。¹³ 不僅第 6 軍的兵力過於分散，無法形成持久作戰的有利態勢，這種類似掩護撤退的部署，亦絲毫沒有與日軍決戰的意圖。蔣中正遂進行局部調整如次：（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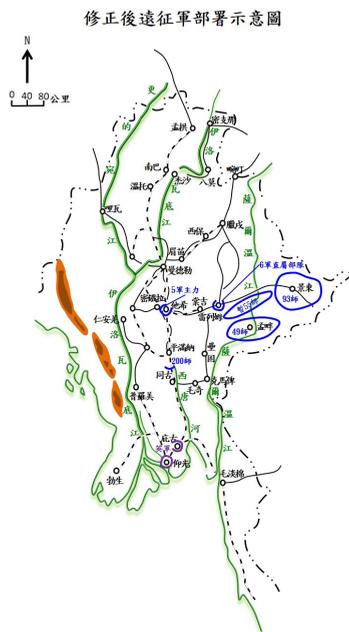
第 6 軍同樣對泰緬邊境實施警戒，但預備隊改由軍的建制部隊暫 55 師擔任，集中兵力形成縱深配置，可行強韌抵抗；第 5 軍方面，不再填補第 6 軍防線缺口，調整為配置在中央地區，緬甸交通動脈的仰曼鐵路要點，概在他希（雜澤，Thazi）南北地區完成集中，以利機動打擊，準備協同英軍迎擊進攻之敵。¹⁴ 其第 200 師應於 3 月 1 日開始輸送，先行入緬，在平滿納（Pyinmana）、同古間地區占領陣地，掩護軍主力集中。¹⁵ 至於預備隊方面，另選派第 66 軍擔任，

12 歸納自「侯騰電何應欽徐永昌五軍以五五師位於羅衣考區四九師於猛畔區九三師於景東區擔任暹羅邊境守備軍等五點部署情形」（1942 年 2 月 24 日），〈遠征入緬（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5-00007-251。

13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8 冊（臺北：國史館，2011 年），頁 396。

1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 18。

1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 18。



▲ 圖 2 修正後遠征軍部署示意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第一冊」（1942年9月30日），〈緬甸戰役得失評判（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72620-00001-001，插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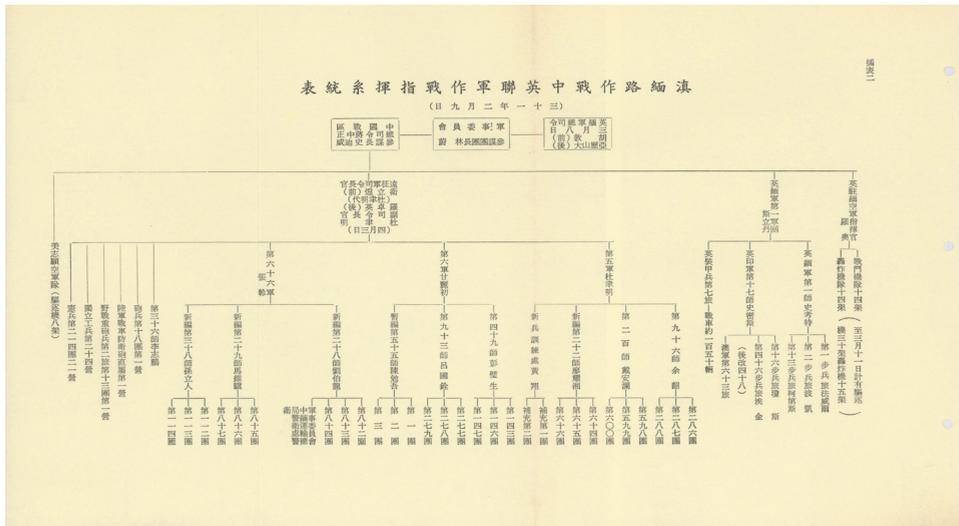
其主力在中緬邊境構築工事，伺機而定。¹⁶ 第 5 軍以集中使用於決戰為主要任務。隔日，胡敦回電同意調整部署。

蔣中正雖然未大幅修正胡敦的兵力部署，但相較於胡敦準備不戰而退的消極思維，蔣則採取較為主動積極的彈性部署。修正後的用兵方案，國軍同樣駐防同古，但不再以填補防線缺口為目的，蔣

16 歸納自「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第一冊」（1942年9月30日），〈緬甸戰役得失評判（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72620-00001-001。

中正賦予第 5 軍伺機取攻勢與日軍決戰的任務。而第 6 軍的主要任務，除保留原先對泰緬邊境擔任警戒外，增加掩護主力兵團第 5 軍東翼的安全。從遠征軍兵力部署計畫的重新調整，得見蔣中正的戰略構想是，若英軍戰敗撤守仰光，而遭日軍隨後追擊，將以攻勢殲滅日軍，光復仰光；若狀況不利，則掩護英軍安全撤退，以確守指揮大軍作戰的主動、攻勢、安全、彈性等原則。

綜觀當時緬甸戰場的雙方態勢發展，概略區分為 3 個作戰正面：中央正面是國軍第 5 軍對上日軍第 55 師團；緬東正面是國軍第 6 軍對上日軍第 56 師團；緬西正面則是英軍對上日軍第 33 師團。（圖 3）



▲ 圖 3 滇緬路作戰中英聯軍作戰指揮系統表

資料來源：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四冊：後期戰役·日本投降及終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第五章插表二。

蔣中正為確保戰略構想能夠確實執行，於3月1日親自飛抵臘戍（Lashio）指導遠征軍作戰，同時與魏菲爾進一步協商。隔日，日軍渡過西唐河，向仰光發起攻擊。蔣中正特別要求魏菲爾，英軍須固守仰光達一星期以上，國軍才有足夠時間完成部署。魏菲爾雖沒有明白表示可以固守仰光多久時間，但卻保證英軍將盡力而為。¹⁷3日，蔣中正召集遠征軍重要幹部，親自面授機宜，預判各種戰略狀況，歸納其要點，認為第5軍能否適時完成戰略集中成為首要關鍵。¹⁸對遠征軍的作戰指導，係儘速在緬甸集中兵力及避免部署過於分散，待形成戰力優勢再與敵決戰。

仰光失陷後

魏菲爾雖然一再保證英軍固守仰光的決心，但該城依然在3月8日失陷，而且並非戰敗退卻，是不戰棄守。從而也使蔣中正對英軍感到徹底失望。表面上看，英軍固守仰光的時間似乎與蔣中正的期望相去不遠。但真正令蔣擔心的，是英軍決定撤守卻未主動告知，而是從廣播中才得知仰光失陷（亞歷山大〔Alexander Harold, 1891-1969〕在仰光下令撤退）。他憂慮聯盟作戰中，高階指揮官各行其是，互不協調聯繫，可能產生重大危機。鑒於英軍的怯弱與毫無聯

17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8冊，頁431-436。

18 蔣中正預判未來四種狀況及處置，參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頁235。

盟作戰的誠信，蔣中正決定重新調整戰略部署。¹⁹ 大軍作戰必須前置考量，重新部署的方案應在西唐河作戰英軍敗退以後，日軍矛頭迴轉，指向仰光時就開始策劃，3月8日仰光失陷，9日蔣中正決定重新部署。

（一）「曼德勒會戰」戰略構想

3月6日，美國陸軍將領史迪威赴華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並將前往緬甸指揮國軍作戰。仰光失陷隔日，蔣中正毫無保留的向史迪威表達對英軍的不滿。²⁰ 他基於仰光失陷後的全般情勢，調整在緬甸的作戰方略，策訂以「曼德勒會戰」為核心的戰略指導，選擇最有利的地區與日軍決戰，3月10日接見史迪威時說明他的指導：

余仍主張，我軍主要任務為保衛曼德勒。曼德勒距仰光約一千里，約合五百公里，曼德勒距我後方據點則無此遼遠，故我增援與給養之供給尚佔優勢。此點應請注意。……惟我第二百師守禦同古之時，仍必集結大軍於曼德勒，蓋一旦普羅姆〔普羅美〕失守，我當待敵深入，及其到達曼德勒附近，予以痛擊，即可開始反攻。

19 「蔣中正日記」，1942年3月9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20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8冊，頁530-531。

……余今決意，守衛該城之責，仍由英軍任之。余則擬立調第五軍之兩師駐守其近郊。……

余月初赴腊戍〔臘戍〕，目的在保持仰光，此亦為國軍入緬之目的，前已言之。今仰光失守，國軍入緬，已喪失其目的。

如欲克復仰光，我必反攻，然我集結部隊需時半月。在此期間中，敵方必儘量增援。仰光戰畧地位有類廣州，敵在各方面皆佔優勢，具備海陸空之便利，我如無足量空軍與砲兵之掩護，克復仰光，殊非易事。克復仰光之信心不堅，實為國軍之心理，將軍必注意及之，故我方欲圖反攻，必另有策劃，其最妥善者，厥惟集結主力於曼德勒附近，誘敵深入，待與交鋒之後，再反攻突破之。國軍習於此種戰畧，將軍應儘量利用之。……

〔史迪威表示：〕蒙坦賜示諸端，如開茅塞，自當敬謹記憶，視如圭臬。承示應瞭解中國軍隊之心理，實屬必要。²¹

蔣中正要史迪威注意補給線問題，主要著眼在於大軍作戰應以後勤為先。他指出曼德勒距仰光 500 公里，距我國境較近，在此決戰無論部隊入緬集中及後勤補給，我軍都佔有優勢。蔣並說明在仰光失陷

21 「蔣中正與史迪威談話紀錄：入緬指揮華軍注意事項及國軍赴緬任務」（1942年3月10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19-015。

後，我國對外的國際通道斷絕，入緬作戰目的已失，當下應以確保曼德勒為先（當時仍由英軍守備），宜在附近地區集結重兵與敵決戰，先擊滅敵軍主力再反攻仰光，準備調派第 5 軍兩個師駐守近郊。

曼德勒為緬甸第二大城，又稱瓦城，係仰曼鐵路（仰光到曼德勒）銜接滇緬路的樞紐，緬甸中部攻必取、守必固的戰略要域。國軍正在逐次入緬，曼德勒為兵力轉運、機動及後勤補給的交通中心，有駐守重兵的必要。蔣中正憂慮敵軍奪得同古後，派遣降落傘部隊至曼德勒，或同時發動第五縱隊進攻，一旦曼德勒發生變亂，影響前方士氣必大，這項憂慮也告知數日後來訪的亞歷山大。²² 亞氏有同感，並請多派中國軍隊前往。蔣中正允諾派遣即將到達的新 38 師，以大部分兵力進駐曼德勒，願意協助英軍構築工事。²³ 並在接見史迪威時表示擬立調兩師駐守近郊。

蔣中正又提醒，要反攻仰光，我軍入緬集結兵力需時半月，敵軍同時也在增兵，仰光就像廣州那樣的大港，具備海陸空的運輸便利，增長兵力比我快速。遠征軍更無足量空軍與砲兵掩護，克復仰光殊非易事，因此官兵信心不足必須注意。由於緬甸民心傾向日方，普遍認為驅逐英軍後可以脫離殖民地的苦難（在緬甸境內佈滿從事

22 周琇環、吳淑鳳、蕭李居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臺北：國史館，2015 年），頁 116。

23 周琇環、吳淑鳳、蕭李居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頁 118。

間諜工作的「第五縱隊」，僅曼德勒城內的 5,000 餘名僧侶，其中過半數為日軍提供情報。²⁴) 第 5 軍到仰光作戰，補給線向南延伸 500 公里，增加安全維護困難，為大軍作戰的敏感要害。蔣中正向新來的參謀長分析當前敵我情勢，認為實不利於國軍在緬甸過度延伸戰線，指出最妥善者為集結主力於曼德勒附近，誘敵深入，待與交鋒之後，再反攻突破之，我軍習於此種戰略，要求史迪威應儘量利用之。

我軍習於此種戰略，係指「後退包圍」的戰法。為劣勢戰力的部隊，為扭轉敵我優劣形勢，殲滅優勢敵軍的戰法。後退是為了創造戰機，包圍著眼於全殲敵軍。係主動選擇對我最有利的決戰地區，先期經營戰場，妥善部署兵力，引敵深入我所選定的決戰地區，再適時發動攻勢包圍殲滅。如同 3 個多月前，1941 年 12 月中旬，發生在中國湖南的「第三次長沙會戰」。國軍以省城長沙為餌，誘敵來攻，利用日軍的攻勢衝力引敵深入，形成口袋陣地，再以長沙城市為袋底阻敵攻勢，集中兵力從敵側翼發動攻勢，形成後退包圍的殲滅戰。此役殲敵 5 萬 6 千餘人，稱為「天爐戰法」。蔣中正稱為國軍慣用戰法，要史迪威儘量運用。由於曼德勒是緬甸中部的交通中心，日軍向北攻略緬甸全境，必先奪此要域。遠征軍可據此誘敵來攻，視曼德勒如同長沙，希望再造一次後退包圍的殲滅戰。

24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8 冊，頁 532-533。

國軍早年聘請德籍顧問協助建軍備戰，西方軍事思想及經典戰史隨之引進。克勞塞維茨曰：「會戰是用主力來進行的戰鬥，那是一種使用所有一切可用的實力，追求真正勝利的鬥爭。」²⁵ 又曰：「會戰被視為集中〔按：指兵力、戰力〕的戰爭，視為整個戰爭或戰役的重心。」²⁶ 依據克氏理論，從3月10日的談話，可以確認英軍棄守仰光後，遠征軍準備在緬甸策劃會戰，選擇於曼德勒附近集中最大兵力與日軍作最後決戰。先殲滅敵軍再乘勝南下，則前無阻攔勢如破竹，可順利收復仰光打通國際通道；戰況不利則沿補給線退回國境內，保存戰力投入持久抗戰。係從戰略上觀照全面，兼顧攻守，確保安全的彈性方案，不是戰術上保衛曼德勒的城鎮攻防戰。會戰通常以攻勢取勝（全面攻勢或先守後攻），以殲滅敵人有生戰力為目的，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只要擊滅敵軍主力，城鎮仍然為我所有，並為反攻仰光之先聲。

「全程構想」為指揮大軍作戰的戰略規劃，用以統一作戰概念，律定部隊行動，必須先期規劃貫徹執行，以掌握戰場主動取得勝利。當時軍事準則沒有明確的分門別類，表達方式和現在也不盡相同，曼德勒會戰的「全程構想」從蔣中正和史迪威的談話還是可以整理出當時的想法。試解讀仰光失陷後遠征軍的作戰概念：「**遠征軍以**

25 克勞塞維茨，（Garl von Clausewitz）著，鈕先鍾譯，《戰爭論》（On Wan），中冊（臺北：軍事譯粹社，1980年），頁387。

26 克勞塞維茨，（Garl von Clausewitz）著，鈕先鍾譯，《戰爭論》（On Wan），中冊，頁404。

曼德勒會戰為核心，主動選擇決戰地區先期經營戰場，預設口袋陣地完成殲敵布署。引敵深入 500 公里縮短補給線，待後續部隊到達，集中兵力再與敵決戰。於日軍主力攻擊曼德勒時避其鋒銳，運用其攻勢衝力側翼暴露時發動攻勢。以一部固守曼德勒阻止尖端，主力從東北向西南打擊側背，殲敵於曼德勒以南附近地區。掃除進路障礙再南下攻克仰光，重開滇緬公路恢復國際通道。」²⁷ 這個概念經過整理，成為更具體的說明，述之於書面即為必須貫徹執行的「全程構想」。按作業程序由遠征軍長官部與軍事委員會共同研議完成。經蔣中正核定後交付遠征軍主要幹部遵照執行，並在史迪威到達時向他說明。

會戰的殲敵地區選定在曼德勒南方附近，第 5 軍主力第 22 及第 96 師於 3 月 23 日以後到達，在曼德勒東北地區集結。²⁸ 爾後第 66 軍新 38 師到達時，將接替英軍守備曼德勒。²⁹ 在兵力部署上，當日主力從南向北攻擊曼德勒時，以新 38 師為拘束部隊阻止尖端。第 22 及第 96 師從東北向西南側擊，殲滅敵軍主力。拘束與打擊的擬案已經完成，只待後續部隊到達，經營戰場完成會戰準備。第 200 師（增配騎兵團、工兵團）推進到葉達西、同古間地區，擔任前方警戒部隊，

27 依據 3 月 10 日及 3 月 19 日蔣中正與史迪威談話紀錄及史迪威日記摘要。

2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 8。

2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 49。同古撤退改在平滿納會戰時，新 38 師即調整為總預備隊。

掩護後續部隊到達後，歸建第 5 軍加強打擊力度。第 6 軍在東翼形成縱深部署，固守要點阻絕道路以掩護側翼，第 66 軍所屬新編第 28、第 29 師到達臘戍以南為總預備隊。³⁰ 遠征軍「曼德勒會戰」已經改變仰光失陷前的兵力部署，原本計畫將第 5 軍配置在仰曼鐵路南段，廣領空間協同英軍迎擊進攻之敵。調整為在緬甸中部進行會戰，選定曼德勒南方近郊為殲敵地區，引敵深入我口袋陣地，集中兵力發動攻勢，側背打擊殲滅敵軍。（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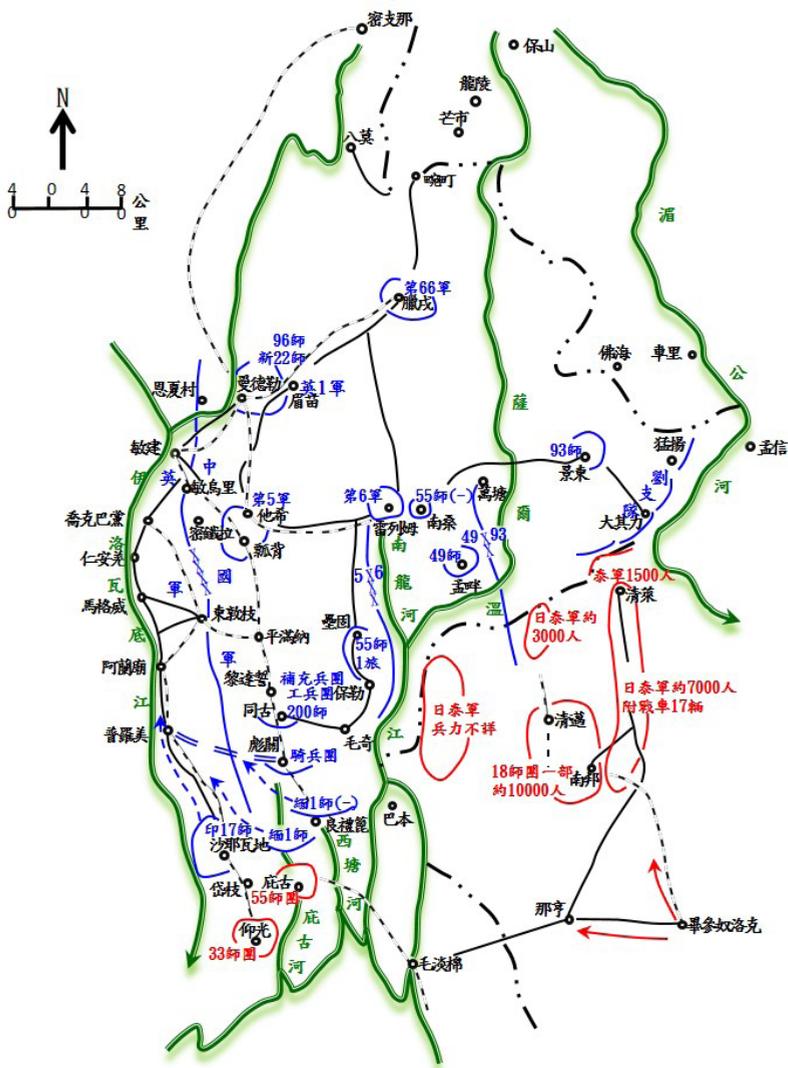
（二）蔣中正與史迪威之間的扞格

史迪威聽完蔣中正說明曼德勒會戰構想後，並不認同曼德勒會戰的用兵指導，兩人對緬甸作戰的戰略構想差異極大，已經到了影響緬甸全局的程度。史迪威在其日記所夾的檔案資料寫道：「抵華履新時，蔣中正告訴我將指揮緬甸的中國軍隊，希望能從他的勸告和經驗中受益。當時，第 200 師在同古，第 22 師即將進駐曼德勒，第 96 師靠近臘戍。我表示打算在同古一帶把這 3 個師集結起來，並未得到同意，他堅持認為曼德勒是形勢的關鍵所在，要不惜一切的堅守。把第 22 師和 96 師部署在那裡，以使那裡有堅強的防禦力量。」

³¹ 史迪威接續寫出他的看法：「實際上，曼德勒毫無軍事意義，沒有

3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 8。

31 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著，林鴻譯，《史迪威日記》（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4 年 6 月），頁 65 日。



▲圖4 1942年3月16日敵我態勢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四冊：後期戰役·日本投降及終戰》，插圖二。1942年3月10日，蔣中正向史迪威說明曼德勒會戰，此圖即為會戰前的部隊概定位置。

一個防禦陣地的有利條件，蔣從未認識到這一點，但他顯然認為曼德勒週邊有城牆圍繞，因而是個有利的防禦據點……由於我們已同英國人商定要盡力保住眉謬至同古的防線，因此我堅持要求他再派 3 個師來。這幾個師既可以保證曼德勒的安全，同時可以向南方投入〔按：進攻仰光〕。」³²

史迪威自認為看到一個反攻的機會，要把第 5 軍的第 22 及第 96 兩個師向南推進到平滿納附近（距曼德約 320 公里），準備支援守備同古的第 200 師作戰（在平滿那南方約 100 公里），甚至重新奪取仰光（距同古約 300 公里）。³³ 顯見兩人對英軍棄守仰光後，在緬甸作戰的戰略目標相同，都是殲滅敵軍，收復仰光，打通滇緬公路，但兩人選擇的決戰地區相距卻達 420 公里。

蔣中正主張選擇最有利的決戰地區完成部署，以曼德勒會戰為中心，初期以此城為遠征軍進入緬甸，以後運輸部隊完成會戰部署的交通中樞，又為補給線上必須確保的要點，地位重要必須確保。會戰時以其為緬中要域的戰略價值誘敵來攻，引敵進入我後退包圍的口袋陣地，先殲滅敵軍再南下仰光就勢如破竹。**若戰況不利，則沿補給線退回國境的轉進安全且距離較近**。蔣中正係從戰略上的會戰布局，以殲滅敵軍主力為目標看曼德勒的地位。**史迪威則認為**

32 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著，林鴻譯，《史迪威日記》，頁 66。

33 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著，林鴻譯，《史迪威日記》，頁 58。

應前推兵力，在同古擊滅北進日軍，即可確保曼德勒安全，再南下攻略仰光。這種攻略的想法，冒險之處在於如後續部隊逐次到達，兵力尚未集中，則形成孤軍深入逐次用兵，有被區分擊滅的危險。

史迪威難以領悟大軍會戰的全程構想，單純從部隊基本戰術上的城鎮攻防看曼德勒價值，認為毫無軍事意義，沒有一個防禦陣地的有利條件。堅持再派 3 個師來，認為只要在同古殲滅敵軍即可保證曼德勒安全，並揮師南下收復仰光。他聽不進去蔣中正所提醒，到仰光決戰的補給線延申太長，敵軍在當地的海陸空調動方便，增長兵力比我快速，我無足量空軍與砲兵掩護，官兵心理應予注意，地方民心傾向敵軍等因素，都沒有聽進去。尤其遠征軍還在陸續入緬，兵力尚未集中，此刻第 5 軍孤軍南下有被各個擊滅的危險。史迪威對於蔣中正所強調的曼德勒會戰，表示：「聽到一個荒謬的戰略概念，其基礎是曼德勒的重要性。」³⁴顯然不了解會戰的要義。

史迪威離開重慶到達緬甸後，依然堅持己見。他先在 3 月 14 日發送電文給蔣中正，要求將新 22 師及第 96 師南下向平滿納集中，準備到更南方的同古會合第 200 師與敵決戰。³⁵17 日他又趕回到重慶晉見蔣中正，隔日雙方進行激烈的爭論。³⁶蔣中正在當天的日記寫

34 史迪威 (Joseph W. Stilwell) 著，林鴻譯，《史迪威日記》，頁 75。

35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48 冊，頁 582。

36 史迪威 (Joseph W. Stilwell) 著，林鴻譯，《史迪威日記》，頁 63。

下對史迪威的觀察：「余告以緬甸作戰方針甚久，惜彼無作戰經驗、徒尚情感，而不顧基本與原則也。」³⁷19日兩人再談，史迪威相當固執，仍希望第5軍全軍南下，形成統帥與參謀長的意見嚴重分歧。

蔣中正面對的雖然是他屬下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且同時也是具有多重身分的美軍在華代表及軍援物質的分配者，在中美外交關係上必須妥善處理的人物。但仍然把握原則，明確下達指示：

我在緬甸作戰應切記兩大綱要：第一、應選擇與敵最後決戰之場所，此場所應在曼德勒以南之近郊；第二、應固守曼德勒。此次在異邦作戰，余至感關切，蓋其危機有二：第一當地民眾傾向敵人，對我並無好感；第二缺少統一指揮。……在此兩種危機未能解除以前，我入緬作戰部隊只應取消極態度，不應過分積極，自不宜遠離根據地向前突進。第五第六兩軍為我國軍惟一精粹之部隊，前已明告將軍；故彼等絕對不能挫折，苟有挫折，其影響將為整個中國不可挽救之損失。……惟念將軍既為予之參謀長又負指揮我軍在緬作戰之責，自當參酌尊意，在駐曼德勒之二師中抽一師赴普羅姆〔普羅美〕前方迤東之唐得文依〔東敦枝，Taungdwingyi〕及阿藍模〔阿蘭廟，Allanmyo〕一帶地區，……

37 「蔣中正日記」，1942年3月18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

余在國內指揮作戰時，未嘗不採取勇猛之戰畧，冒險嘗試。惟今在異國作戰，不得不加以審慎。

.....

倘能按照余所規定之戰畧切實實行，勝利必屬於我。他日反攻準備成熟之時，余必通知將軍，惟在目前應取守勢，切勿輕進以求僥倖。³⁸

史迪威表示當謹遵命為之，蔣告以下月中旬我方入緬部隊可達 5 至 6 個師。

經過幾次交談，蔣中正明白史迪威執意在同古決戰，再南下收復仰光。認為該講的都講了，於是定調緬甸作戰的兩大要點：其一，優先選擇決戰地區，在曼德勒以南的近郊，應做為一切計畫的基礎。其二，固守曼德勒，此地為國軍陸續入緬及爾後部隊機動、兵力轉用的樞紐，為補給線上必須確保的要點。並再次提醒史迪威，緬甸民心傾向日軍及緬甸戰區缺少統一指揮為兩項危機。也表示第 5、第 6 兩軍的精銳部隊不能損失，否則對中國的損失難以挽回。最後明確指示「惟在目前應取守勢，切勿輕進以求僥倖」（當時史迪威表示

38 「蔣中正與史迪威談話紀錄：在緬甸作戰與日軍最後決戰在曼德勒以南近郊等」（1942年3月19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19-026。

遵命為之)。此際，遠征軍兵力尚未集中，4月中旬才能再到達5至6個師，在此之前不是決戰時機。所述各項是授權史迪威到緬甸指揮遠征軍作戰，必須遵守的命令。

蔣中正為了不使新到任的參謀長感到難堪，不再堅持將第5軍主力部署在曼德勒，但也沒有全部接受史迪威的建議，而是採取折中方案，將新22師從曼德勒東北地區，前推至南方的東敦枝。第6軍各部隊接續進入緬甸，逐次進行會戰部署。

蔣中正在授權史迪威到緬甸指揮部隊時，為避免他建功心切，率性而為，執意要在同古決戰，而不接受「曼德勒會戰」的構想，進而影響曼德勒會戰的全局戰略。因此，21日蔣中正要史迪威親自攜帶自己的手令，由重慶飛抵臘戍，向遠征軍主要幹部宣達。其重要指示要旨如次：

- 一、派一師至唐得文伊〔東敦枝〕、阿藍廟〔阿蘭廟〕間地區，作為普羅美方面之英軍總預備隊，專備反攻增援之用，決不擔負守備任務，如敵以一個師團向普羅美進攻，而英軍無久守防地至二三日之精神，則我軍應在唐得文伊〔東敦枝〕、阿藍廟〔阿蘭廟〕所駐地區內固守待機。

- 二、對史迪威參謀長之命令，應絕對遵守。
- 三、凡在國外部隊，以「不輕進，不輕退」二言為要訣，在前方全般情勢有利於出擊反攻或捕捉戰機時，則應決心出之以積極行動。
- 四、我軍在同古、平滿納方面陣地之兵力，應以現有者為限。
- 五、我軍決戰地區，必在曼得勒〔曼德勒〕附近之要旨，切不可忽略。
- 六、據杜聿明軍長函稱，亞歷山大將軍作戰方針，在保護彥南陽（仁安羌）之油田，如果照此方針，則我軍一師兵力，不可到阿藍廟〔阿蘭廟〕，只可到唐得文伊〔東敦枝〕。
- 七、棠吉、羅衣考、及其前方部隊，仍應由暫編第五十五師派兵一團擔任，不必變更。
- 八、同古必須死守，英軍在普羅美未撤退以前，我軍決不能先撤同古陣地。³⁹

這份手令中，雖然第二項在重申史迪威的指揮權，但其餘後面項目都在確保曼德勒戰略構想能徹底執行。第三項是給予遠征軍前方將領可以建議史迪威不宜輕易冒進；第四項則是限制史迪威不得

在同古擴大戰事與日軍決戰；第五項再次明確指示曼德勒才是決戰地區；致於第八項，是律定死守同古的前提，在於英軍未撤離普羅美之前，必須確守聯盟作戰的誠信，達成任務後仍須適時轉進。手令的作用很明顯在防止史迪威冒險急進，確定「曼德勒會戰」按計畫準備，可處於有利地位與日軍做一次總決戰。

史迪威到緬甸指揮作戰，蔣中正手令上稱「史迪威參謀長」，那是他在中國戰區的正式官銜，係以幕僚長的身分受命指揮部隊。至於緬甸戰區的指揮關係，3月27日蔣中正接見亞歷山大時，對此有初步的共識，亞歷山大同意全部緬甸戰局由他指揮，包括史迪威部下的中國軍隊在內。亞歷山大曾詢問，此意是否電告史迪威。蔣說明：**「史蒂威爾〔史迪威〕將軍在此時，余已面告之，惟曾囑彼如涉及全局戰略及部隊之配置必先得余之同意。將軍與史蒂威爾將軍可討論作戰之任何問題，惟若欲變更戰略及部隊之配置，應如今日討論情形，事先得余之同意，緬甸為英國屬地，英方自應多負責任。」**⁴⁰

蔣中正對亞歷山大及史迪威兩人在緬甸指揮中國軍隊的權力和界限，說明非常清楚，變更戰略及部隊配置必先得到同意。他也同意史迪威的建議，包含在緬甸的指揮權限：兵力部署遵照核定的計畫；對敵人的行動，可以適當調整部署；戰鬥開始時，指揮權可以不受

40 周琇環、吳淑鳳、蕭李居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頁103。

干預。⁴¹ 例如仁安羌作戰時以兩個團增援英軍屬於適當調整部署（變更部隊配置），羅卓英（1896-1961）即向上峰呈報，蔣中正電覆：「新編第三十八師迅以兩個團增援英軍方面，並具報。」⁴² 均按規定辦理。中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殖民地。把武裝部隊交由盟軍指揮，在互信不足的情況下，明確律定指揮權責非常重要。

21 日夜 22 時，史迪威即在臘戍下達作戰命令，決心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庇古北進之敵，並與英軍協同作戰。遂令杜聿明率部南下，統一指揮同古作戰，其命令第三項包含下列行動：

一、第二百師及第五軍直屬部隊，暨第六軍之暫編第五十五師主力，歸杜〔聿明〕軍長指揮，擔任同古方面之作戰，暫編第五十五師應由現地向瓢背〔Pyawbwe〕附近輸送。

二、第五軍之新編第二十二師，即由曼德勒開抵唐得文伊〔東敦枝〕附近，歸余直接指揮，準備支援普羅美〔Prome〕方面之作戰。

41 「蔣中正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 年 3 月 19 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三）》《戰時外交》（三），頁 576-580

4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 67。

三、第六軍方面，就現在部署，準備拒止由泰國方面來攻之敵；但毛奇方面仍應依參謀團原定計畫，派暫編第五十五師之一部，接替英緬第一師第十三旅之防務，並在該方面確實佔領要點，構築工事，拒止來犯之敵，以掩護同古正面我軍之左側背。

四、第九十六師為總預備隊，即開曼得勒附近，歸余直接指揮。⁴³

史迪威帶著蔣中正授權他指揮遠征軍作戰的手令到緬甸，當天所下達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擴大同古戰事，違背手令第四項「**我軍在同古、平滿納方面陣地之兵力，應以現有者為限**」。同古只有第 200 師增加騎兵團擔任前方警戒，其任務在掩護後續部隊進入緬甸及英軍撤退，不在決戰。距曼德勒約 400 餘公里縱深可以實施遲滯作戰，爭取時間以在預先選定的決戰地區經營戰場，策劃口袋陣地及完成會戰準備。史迪威則命杜聿明指揮直屬部隊（負責後勤支援的英軍因為缺乏油料，輕重火炮及戰車還集中在中緬邊境的畹町）及第 200、第 55 師在同古作戰，自己直接指揮第 22 及第 96 師，也就可以隨時投入戰場擴大戰事。這道命令形同放棄曼德勒會戰，前推兵力到同古作戰再南下仰光。完全改變緬甸作戰的全局戰略，並沒有

4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 26。

得到授權。此刻遠征軍還在區分梯次入緬，部隊並未集中，第5軍以現有兵力與敵決戰，逐次使用兵力有被各個擊滅的危險。3月19日史迪威準備到緬甸領軍之前，蔣中正和他再談時曾經提醒：「第5第6兩軍為我國軍惟一精粹之部隊，故彼等絕對不能挫折，苟有挫折，其影響將為整個中國不可挽救之損失」，「他日反攻準備成熟之時余必通知將軍，惟在目前應取守勢，切勿輕進以求僥倖」，當時史迪威表示當謹遵命為之。21日到達緬甸則不守誠信，行險求勝準備在同古與日軍決戰再南下仰光，違抗蔣中正「決戰必在曼德勒」的全局戰略。

結語

審視歷史上影響戰爭成敗的因素，仍以戰場勝負最具決定性。一次會戰的勝負，可影響武力戰全局成敗。探討遠征軍作戰失利的論述甚多，以擅改決戰地區，未按會戰的全程構想貫徹執行，導至喪失戰場主動最為關鍵。大軍作戰由於部隊龐大，機動與轉移費時，整合與協調詳密，具「計畫性」與「鈍重性」。宜先期籌劃，充分準備，戰事一經啟動，則應貫徹「全程構想」，避免輕易更動。各級按整體計畫配合執行，則可掌握戰場主動以取得勝利。仰光失陷後，遠征軍以「曼德勒會戰」為核心，策劃「後退包圍」的慣用戰法，先殲滅敵軍主力，再南下光復仰光的全程構想。史迪威奉命到緬甸

指揮遠征軍作戰，擅自將決戰地區前推同古，未按「曼德勒會戰」計畫全程構想的指導方向遂行作戰指揮，改變緬甸全局戰略，是埋下遠征軍入緬作戰失敗的遠因。

盟軍眼中的中國遠征軍： 從英國檔案看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

應俊豪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前言

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在緬印戰場的扮演的角色，已有許多研究成果，特別是在 1942 年第一次緬甸作戰與 1943 年起的第二次緬甸作戰等方面。¹ 但是關於中國遠征軍的籌建始末、中國駐印軍的編成及其衍生而出的諸多爭議，仍有一些尚待深入探討的空間。事實上，無論是中國遠征軍或是入緬作戰失利撤至印度整編的駐印軍，均與英國關係密切。但以往有關兩者的研究，多半均側重從中、

* 本文主要內容乃是整理與縮刪自筆者先出版的兩篇論文，故讀者如對本文有興趣，建議直接參閱這兩篇論文，論述上也較為完整，參見應俊豪，〈從英國檔案探究中國遠征軍與中緬印補給路線〉，收入周惠民編，《檔案中的中國遠征軍》（臺北：政大出版社，2022 年），頁 229-271；應俊豪，〈中國駐印軍與中英美同盟下的暗流〉，收入王文隆編，《中國遠征軍與國際關係》（臺北：政大出版社，2021 年），第六章，頁 129-156。

1 此類成果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是戰史研究，其二則是親歷者的回憶或口述歷史，其三是相關史料彙編等，相關成果非常豐碩。舉其要者，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緬北及滇西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滇緬路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年）；時廣東、冀伯祥，《中國遠征軍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 年）；羅學蓬、舒鶯，《中國遠征軍》（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年）；袁梅芳、呂牧昀編著，《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香港：紅出版、青森文化，2015 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暨回憶記錄》，上下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 年）；周琇環、吳淑鳳、蕭李居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臺北：國史館，2015 年）等。

美兩國視角來分析其在對日作戰上的軍事地位，而忽略了英國在前述作戰與爭議中所居的關鍵地位。中國遠征軍的成立，起初主要是為了支援英軍在緬甸的防衛作戰，而中國駐印軍的編成，則是在緬甸作戰失敗後，由撤往印度的遠征軍部分部隊所組成。究其實際，前者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可謂是中國應英國之請而派出援軍，而後者的組成，雖與美軍指揮官史迪威的大力推動有關，但也需要英國同意，方能讓中國軍隊長期駐紮於印度，進行組訓與換裝。

其次，必須強調的，本文將不再重複累述中國遠征軍或駐印軍在滇緬作戰的詳細過程與歷史意義，畢竟此類議題已有不少研究與成果。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乃是試圖透過英國檔案中，有關上述問題的史料記載，從中發掘出一些有趣且前人較少關注到的議題，從而對於二戰期間的中國與緬印戰場，有更豐富的理解與認知。其次，因本文主要使用英國檔案，故研究途徑，乃偏向以英國的視角與觀點，切入緬印戰場，如此或許適足以跟素來以中文檔案與資料為重心的中國抗戰史研究，進行某種程度的對話與比較。²

關於中國遠征軍的籌組及其爭議

關於中國遠征軍的成立，無論是當時的參與者或是後世的研究者，一般都指向 1941 年 12 月 23 日的《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

2 因檔案文件內容較為繁雜，為使行文順暢與論述聚焦，本文所附之檔案擷圖，僅為局部關鍵段落。

³ 但是考察中、英相關檔案，均未見該協定。探究歷史脈絡，中國遠征軍的出現，到底應該歸諸何時、何事？

（一）中國遠征軍的提議

根據英國外交部遠東司（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的內部備忘錄資料，蔣中正（1887-1975）早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即已經就派兵協防緬甸問題，與英國有所交涉。1941年7、8月間，蔣中正向英國駐華大使館武官提出一項建議，那就是由中國派遣一支10萬人的部隊離開中國作戰，主要是為了協防緬甸，並由英國負責該批部隊的武器裝備與部署調度⁴。

蔣中正之所以在此時提出要派兵協防緬甸，其實與世界局勢的重大變動有關。1941年6月，德軍入侵蘇聯，德蘇戰爭爆發，7月，日軍趁機推動南進政策，往東南亞步步進逼，占領法屬越南南部地區，從而使得英屬馬來亞、緬甸以及荷屬印尼等均感受到唇亡齒寒之憂，危機迫在眉睫。但受到歐洲戰事的牽制，英國不太可能再增

3 例如曾任中國遠征軍副司令官兼第5軍軍長的杜聿明（1904-1981）在其回憶中，即稱自該協定簽署，中、英兩國即處於軍事同盟的狀態。參見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1-39。

4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Minutes of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June 1942,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FO 371/31621, T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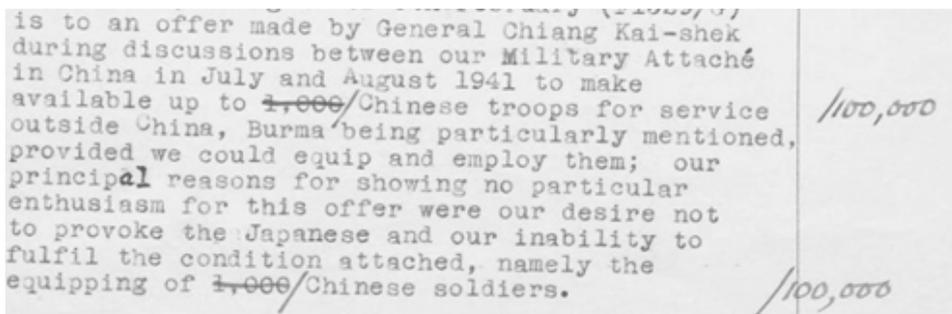
兵亞洲，來因應日本未來可能的威脅。也因此，蔣中正遂順勢提出由中國出兵協防緬甸，希望藉此增加英國抗衡日本的底氣。

但當時英國對於蔣中正的提案，並未顯示出熱衷的態度，此乃歸因於兩項因素：其一，英國還不想觸怒日本，其二，英國並不具備能夠裝備 10 萬人部隊的條件與能力。因此，蔣中正派軍協防緬甸的計畫，並未獲得實現。一直要到珍珠港事變發生、美國參戰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英國也才同意接受中國派軍增援緬甸。⁵

（二）英國請求中國派軍協防緬甸

另外一方面，與此同時，由於英軍在馬來亞戰場的失利，以及顧慮到緬甸的防禦力量相對薄弱，恐無力阻擋日軍的進攻，故英國駐華大使與武官乃於 12 月 16 日進見蔣中正，請求中國給予軍事援助。在此次晤談中，英國武官向蔣中正提出了三項請求，其中第二項便是關於中國軍隊協防緬甸問題。英國要求中國提供協防緬甸的軍隊，派遣一個陸軍師，並準備另外一個師當作後備兵力，以便必要時可以馳援。蔣中正則認為防禦緬甸就是防禦中國，遂同意派遣為數達 5 萬人的軍隊進入緬甸地區，由英屬緬甸軍總指揮官統率，但應指定固定駐防區域，不應與其他緬甸部隊混和在一起，以免發

5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Minutes of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June 1942,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FO 371/31621, TNA.



▲ 圖 1 檔案 1: 英國外交部遠東司的內部備忘錄 (1942 年 6 月)

註一：此份文件是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內部在檢討 1942 年緬甸作戰功過時，由幕僚官員撰寫的備忘錄 (Minutes)，以回顧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的來龍去脈。

資料來源：“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Minutes of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June 1942,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FO371/31621, TNA.

生不必要的麻煩。在會談中，蔣中正並一再重申聯合作戰計畫的重要性，希望中、美、英等能夠在新加坡、緬甸、印度等東南亞地區作戰上，攜手合作共同擬定作戰計畫與步驟。⁶ 此次中英會談記錄中，所提及的出兵緬甸之事，應該就是後來中國遠征軍的前身與濫觴。

在上述晤談結束後，英國駐華大使館武官給英國陸軍部 (War Office) 的報告中，強調在現階段的作戰中，中國的軍事援助至關重要，但是中英軍事合作的關鍵，在於英國能否獲得蔣中正的信任。英國武官並建議，英屬印度軍總司令應該盡早派遣軍事官員來重慶，與中國直接商討軍事合作的細節⁷。

6 “Military Attaché, Chungking to the War Office,” 16 December 1941, Anglo-United States-Chinese Co-operation against Japan, FO 371/27753, TNA.

7 “Military Attaché, Chungking to the War Office,” 16 December 1941, Anglo-United States-Chinese Co-operation against Japan, FO 371/27753, TNA.

為了挽救英國在緬甸可能面臨的危急情勢，同時也為了回應前述蔣中正軍事同盟的提議，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在 1941 年 12 月 17 日召開會議，商討與中國軍事合作之事。在會議中，決議派遣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Archibald P. Wavell, 1883-1950）作為正式代表，前往重慶與蔣中正討論軍事合作細節。參謀首長委員會並決定以英國總參謀長的個人名義，給蔣中正本人的電報一封，由魏菲爾帶去面交蔣中正。在該電報中，英國總參謀長對蔣中正提案出兵緬甸協助防禦等，表示極大感謝之意。⁸

（三）中國遠征軍的商定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根據英國陸軍部針對中國遠征軍一事所做的備忘記錄，很明顯中英雙方並未真正簽署有正式的協定。嚴格來說，應該只是中英軍事會談上所做成的一項作戰計畫。而敲定此項作戰計畫的，則是蔣中正本人與英屬印軍度總司令魏菲爾。但是魏菲爾為何會在 1941 年底突然訪問重慶，並與蔣中正進行會談，最終商妥中國派遣遠征軍至緬甸作戰之事呢？事實上，誠如前述所言，他正是接到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的命令，在該年 12 月下旬，專程經仰光（Rangoon）前往重慶，以商討中英軍事合作事宜。

8 “Minute of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 War Cabinet,” 17 December 1941, Anglo-United States-Chinese Cooperation against Japan, FO 371/27753, TNA.

As regards (b) he regarded defence of Burma as defence of China and
could send an Army Corps of 50,000 men tomorrow. They would be under command
of C.O.C. Burma while in Burma but he must insist they must be given definite
area or line of communications to guard and not mixed up with Burma troops.
Otherwise no one could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anything.

▲ 圖 2 檔案 2: 蔣中正與英國駐華大使、武官的晤談記錄 (1941 年 12 月 16 日)

註二：戰時英國駐華官員往往透過兩種途徑向英國政府進行匯報，其一是由大使館向外交部報告，其二則是由使館武官向陸軍部回報。因為戰時的關係，凡是與作戰相關事務，有時牽涉到機密與時效性，往往先由武官向軍方進行匯報。此份報告即為英國駐華大使館武官陪同大使薛穆 (Horace J. Seymour, 1885-1978) 面會蔣中正後，將相關軍事合作事宜，向英國陸軍部回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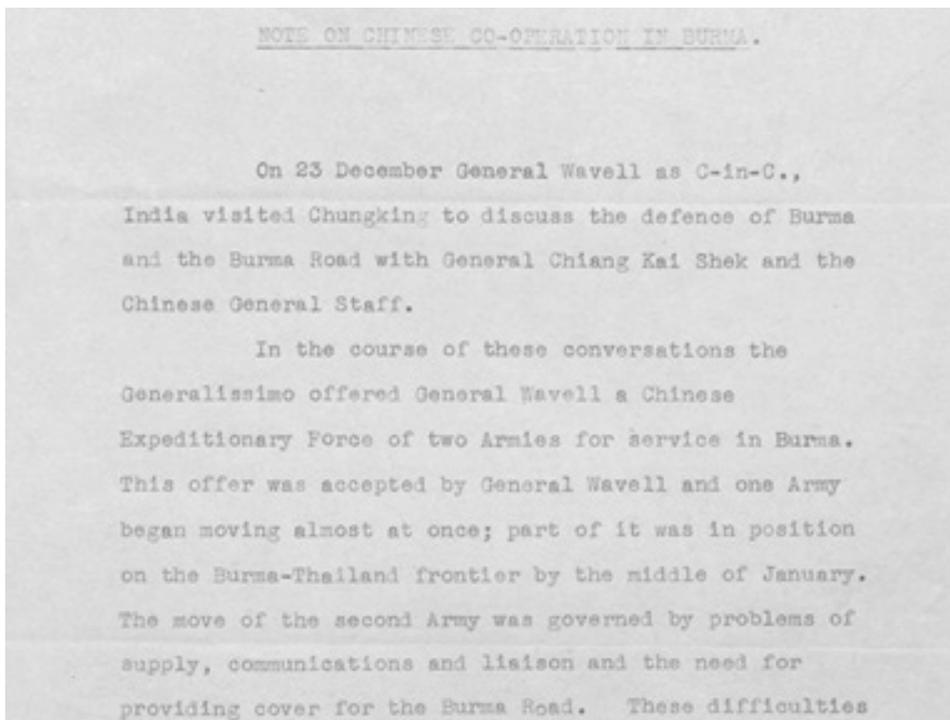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Military Attaché, Chungking to the War Office,” 16 December 1941, Anglo-United States-Chinese Co-operation against Japan, Anglo-United States-Chinese Co-operation against Japan, FO 371/27753, TNA.

24.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Previous Reference: C.O.S. (41) 421st Mtg. Min. 10).
THE COMMITTEE referred to the following telegrams:-
(i) A personal telegram⁺ for the Chief of the Imperial General Staff from General Wavell on his proposed visit to Rangoon and to Chungking.
(ii) A telegram from the Military Attache Chungking reporting an interview with Chiang-Kai-Shek.
In discussion it was agreed that General Wavell should be authorised to proceed from Rangoon to Chungking to discuss with Chiang-Kai-Shek the various proposals which he had made for co-operation.
THE COMMITTEE :-
Approved the terms of telegrams⁺ to the Military Attache at Chungking and to the Commander-in-Chief India and invited the War Office to despatch them.

▲ 圖 3 檔案 3: 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會議記錄 (1941 年 12 月 17 日)

註三：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為英國戰時內閣下，最重要的軍事幕僚會議，由各軍種高階將官組成，除商討有關作戰的大方向外，並提供軍事的專業建言。故有關作戰事宜，參謀首長委員會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資料來源：“Minute of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 War Cabinet,” 17 December 1941, Anglo-United States-Chinese Co-operation against Japan, Anglo-United States-Chinese Co-operation against Japan, FO 371/27753, TNA.



▲ 圖 4 檔案 4: 英國陸軍部關於中英在緬甸軍事合作的備忘錄 (1942 年 6 月 23 日)

註四：此份文件為英國陸軍部針對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一事所做的內部摘要報告，詳細交代其始末。
資料來源：War Office, “Note on Chinese Cooperation in Burma,” 23 June 1942,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FO 371/31621, TNA.

12 月 23 日，魏菲爾與蔣中正及其軍事幕僚們，正式就緬甸以及滇緬公路的防禦問題進行討論。在該次會談上，蔣中正提出要派遣「兩個軍的中國遠征武力，用於緬甸作戰」(a Chinese Expedition force of two Armies for service in Burma)，魏菲爾則表示同意，雙方並決定：應立即調動其中一個軍，並在 1942 年 1 月中前，部署在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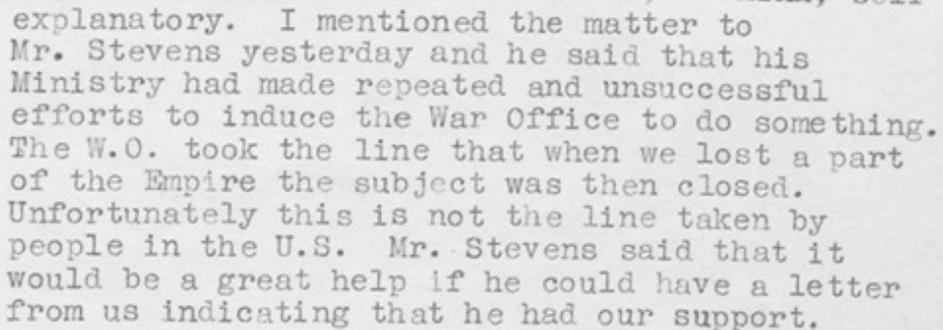
國與緬甸邊界上，而另外一個軍，則視補給、運輸與聯繫情況，以備支援滇緬公路的防禦工作。此次蔣中正與魏菲爾的軍事會談內容及其決議事項，應該就是中國遠征軍最早的由來。

（四）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失利後的中、英嫌隙

雖然透過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的訪問重慶，與蔣中正本人當面敲定由中國派軍協防緬甸與滇緬公路，但事實上，中、英雙方於中國軍隊進入緬甸，在細節安排與時程上，依舊還是有不少的矛盾。特別是英國方面認為中國顯然在刻意在操弄中國遠征軍議題，甚至不惜在美國發動反英輿論宣傳攻勢，一方面致力於美化或「神話化」中國遠征軍作用與重要性，另外一方面則將中英之間種種嫌隙與不合，以及作戰的失利，均歸咎於英國的抗拒與故意阻礙，從而間接導致美國人對於英國的不諒解⁹。

究其實際，根據英國外交部內部備忘錄的分析，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一事，確實有所延遲。1941年12月魏菲爾訪華，雖然與蔣中正迅速議妥中國派出兩個軍出境作戰，但後續的軍事調動情況卻不如原先預期。首先，第六軍的兩個師雖然很快就進入緬甸協防，但該軍的第三個師卻遭到種種阻礙，延宕至1942年1月下旬，方始獲

9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Minutes of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June 1942,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FO 371/31621, TNA.



explanatory. I mentioned the matter to Mr. Stevens yesterday and he said that his Ministry had made repeated and unsuccessful efforts to induce the War Office to do something. The W.O. took the line that when we lost a part of the Empire the subject was then closed. Unfortunately this is not the line taken by people in the U.S. Mr. Stevens said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help if he could have a letter from us indicating that he had our support.

▲ 圖 5 檔案 5：英國外交部與情報部官員的內部溝通紀錄：關於英國陸軍部對於報紙指控英軍在遠東地區作戰不力的態度（1942 年 6 月）

註五：此份文件為英國外交部遠東司的內部備忘錄，詳述外交部官員與情報部協調，試圖遊說陸軍部出面，以駁斥外界對於英軍在緬甸作戰不力的指控。

資料來源：“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Minutes of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June 1942,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FO371/31621, TNA.

得同意進入緬甸。至於另外一個軍（即第 5 軍），則更是拖到 2 月初，才開拔前往緬甸。而中國遠征軍在調動上的延遲，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分析，很大程度上，可能肇因於兩點：其一可能出自英軍部隊的阻礙，其二則來自於蔣中正本人，因為他要求中國遠征軍的軍事調動，均必須再獲得他的正式批准與授權，以致於程序拖延費時。¹⁰

事實上，英國外交部亦坦承中英軍事合作，可能帶來不小的政治風險，那就是在印緬戰場的英軍部隊指揮當局對於中國軍隊入緬作戰一事，或多或少還是抱持著抗拒心理，也不太願意動用中國軍隊。而這種情況的出現，很有可能讓英國進一步坐實前述新聞輿論

10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Minutes of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June 1942,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FO 371/31621, TNA.

上對於英國的惡意攻訐。也因此，英國外交部早先多次向英國軍方示警，請多加注意，並希望陸軍部能夠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以駁斥報紙上的不實指控。英國外交部甚至還曾透過情報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輾轉向陸軍部疏通，但是結果卻收效甚微。英國陸軍部對於前述指控的態度，似乎並不太放在心上，他們認為在遠東軍事上的失利就是失利，無須為此再多加解釋。¹¹

在陸軍部的消極態度下，也因此，英國外交部始終無法找到有力的證據，來駁斥外界對於英軍作戰不力的指控。特別是當此類宣傳口吻，一旦找到某些可供藉題發揮與炒作的素材時，將造成不小的影響。而在報紙輿論有意的推波助瀾下，對於英國在遠東地區作戰不力的指控，也就逐漸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英國外交部認為，如果放任不理，長此以往下來，可能會導致英國在美國的形象急遽惡化，影響到美英關係。英國外交部也坦承，雖然他們一直致力於對抗那些過於貶抑英軍表現與刻意美化中國軍隊作戰能力的輿論宣傳，但卻總是有心無力。他們相當擔心，未來盟軍只要在遠東地區軍事作戰上稍有不順，一些有心人士很有可能會舊調重彈，將軍事失利的責任往英國身上丟，使其成為代罪羔羊。所以為了亡羊補牢，英國外交部建議與情報部攜手，在美國進行輿論宣傳，盡可能地公開對英國有利的資訊，化被動為主動。畢竟一再的否認指控，只會

11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Minutes of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June 1942,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FO 371/31621, TNA.

讓外界誤以為英國心虛，反而顯得有些欲蓋彌彰，所以與其被動防禦澄清指控，倒不如主動出擊，甚至可以考慮「禮尚往來」，反過來指控中國軍隊的作戰不力，以抗衡與中國方面的輿論宣傳攻勢。¹²

三、關於中國駐印軍及其擴編爭議

1942年4月，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失敗後，殘存部隊陸續往雲南方向北撤，但亦有少部分部隊，經緬甸北部往西撤，輾轉進入印度。¹³10月，在美軍駐華總司令兼中緬印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 1883-1946）的居中斡旋下，英國與印度政府最終同意，上述先後經緬甸撤往印度，總數約2萬多名的中國軍隊，前往印度蘭伽（Ramgarh）集結，並在美軍的協助下，進行訓練與換裝。¹⁴於是，乃成立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由史迪威擔任總指揮，羅卓英（1896-

12 “Philip Broad, Foreign Office to R. B. Stevens,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10 June 1942, Employment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FO 371/31621, TNA.

13 撤往印度的部隊主要有兩支。一支是由孫立人統率的新編第38師（原隸屬於第66軍），該師原先受命掩護英軍撤退，後在史迪威的指示下，經緬甸北部撤往印度英帕爾（Imphal）。另外一支，則是由杜聿明統帥的第5軍直屬部隊及其麾下的新編第22師，則是由緬甸撤往印度雷多（Ledo）。參見鄭洞國，〈中國駐印軍始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71-84。

14 Telegram 26668, C.O.S., 27 October 1942 & Telegram C.O.S.(India) 88, 28 October 1942,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蔣中正在其日記稱，在1942年5月，即已決定要讓第5軍留在印度，且不與英國談條件。參見「蔣中正日記」，1942年6月15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但事實上，根據英國檔案，史迪威一直為中國軍隊駐印之事反覆與英國交涉，一直到1942年10月，方始獲得英國同意中國軍隊留在印度。

1961) 為副總指揮，下轄 1 軍 2 師 (新編第 1 軍、新編 38 師、新編 22 師)，由鄭洞國 (1903-1991) 任軍長，孫立人 (1900-1990)、廖耀湘 (1906-1968) 為師長，此即為中國駐印軍的由來。¹⁵

依照史迪威原先規劃，上述部隊在完成訓練與換裝美式裝備後，其主要任務，乃是在未來負責反攻緬甸北部地區。不久之後，1943 年 2 月，史迪威聲稱獲中緬印戰區總司令蔣中正的指示，又向英國政府要求提高中國駐印軍的部隊規模，擬從原先的 2 個師，提高為 3 個師，兵員總編制人數，亦升至 42,000 人。¹⁶ 英國對於擴編中國駐印軍一事，不無懷疑態度，然顧及盟軍內部的協調，躊躇再三，最終還是同意了史迪威的要求。¹⁷ 究其實際，英國陸軍部即相當擔心中、美兩國會得寸進尺，一再要求提高駐印軍的部隊人數，故曾授意由駐紮當地的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出面，向中、美兩國清楚表達英國的態度，希望對駐印軍人數設定上限，不能一再擴編，否則將會造成印度方面很大的困擾。¹⁸ 然而僅數月之後，史迪威卻再次向英國提出要求，計畫將駐印軍的編制人數，由原先的 42,000 人，一舉提高至 10 萬人。¹⁹

15 鄭洞國，〈中國駐印軍始末〉，頁 71-84。

16 Telegram 39499/C, 23 February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17 Telegram 4059, 4 March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18 Telegram 57608, 4 March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19 1943 年 5 月 31 日，史迪威在與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進行會談時，口頭提出要將中國駐印軍擴編為 10 萬人的方案。以上關於中國駐印軍成立過程以及史迪威歷次向英國政府提出的擴編要求，均參見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 War Cabinet, "Move of Additional Chinese Troops to India," 23 June

究其實際，在美軍的規劃與大力協助下，短短約半年多的時間，即試圖在印度蘭伽整編，打造出一支高達 10 萬人的中國大軍，不可避免地，會引起英國方面極大的不安與疑忌。況且，一旦這支軍隊編成後，投入緬北反攻作戰，隨著戰事的進展，美國與中國在印度與緬甸的實質影響力，勢必與日俱增。這對於長期以來視印度與緬甸為禁脔的英國，可能構成潛在的威脅，甚至削弱未來英國在亞洲的核心利益。

表1：史迪威推動下中國駐印軍的歷次擴編計畫²⁰

時間（年月）	項目	計畫編制（人數）
1942.10	原先撤退至印度人數	20,000-30,000（2個師）
1943.02	第一次擴編	37,000-42,000（3個師）
1943.05	第二次擴編	100,000 （後降為58,000，編為2軍5師）

另外一方面，英國雖然自始即對中國駐印軍抱持疑慮，但該軍不但體現著中、美、英三國能否通力合作共同對日作戰的關鍵指標，同時也肩負著未來反攻緬甸作戰的重責大任。依照史迪威原先的規劃，中國駐印軍所需裝備、訓練與物資，均由美方負責供應，但事實上，自中國駐印軍成立之初，英國支援其的各類武器裝備與軍用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20 Telegram 26668, C.O.S., 27 October 1942 & Telegram C.O.S.(India) 88, 28 October 1942,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Telegram 39499/C, 23 February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Chinese Troops for India,”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物資，亦不在少數。²¹ 由此觀之，英國並非全然排斥中國駐印軍，仍盡力提供其所需的物資，故英國對其的觀感，可謂相當複雜、愛恨交加，懷疑中或許依然帶著不小的期許，盼望中國駐印軍能夠換裝完成，並與英軍並肩作戰，收回緬甸。

（一）第一次擴編計畫

1942年10月，在史迪威的斡旋與壓力下，英國雖然同意中國駐印軍的成立，但實際上對於中國意圖藉由軍事行動染指緬甸、印度地區的疑慮愈益加深。不久之後，1943年2月，史迪威又轉達中緬印戰區總司令部的請求，希望英國同意，將駐印軍編制規模，由原先的2個師，提高為3個師，也就是大約需再額外派遣約1萬人至印度。²² 此舉自然更加引起英國方面的擔憂。追根究柢，英國軍方與政府內部自始即對中國駐印軍的存在，心生疑慮。英國空軍部以及供應部，均希望英國政府能夠出面阻擋中國駐印軍的擴編，以免增加其負擔。英國印度緬甸部，則對日益增加的中國部隊出現在印度，而感到憂心不已。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甚至直接詢問陸軍部，除了進行組訓與換裝外，中國駐印軍是否還帶有其他任務或動機。

21 “Lieutenant Colonel G. W. Wren, War Office to Ashley Clarke, Foreign Office,” 21 September 1943,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FO 371/35827, TNA.

22 “Inward Telegram,” Viceroy, Siml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25 February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²³ 事實上，早自中國駐印軍成立開始，英屬印度軍可能很早即自行採取種種防範措施，甚至不惜派出密探，深入雲南地區，蒐集中國軍隊與緬北地區人民的聯繫情況，即是擔心未來反攻緬甸行動開始後，中國可能有損及英國殖民統治利益的圖謀。²⁴

在英國陸軍部給英屬印度軍總司令的魏菲爾的電報中，亦清楚流露出英國軍方對於中國駐印軍的強烈不安。

毫無疑問地，中國人也關注著未來，認為未來在反攻緬甸時，扮演的角色越重要，他們越能夠影響著緬甸的未來。他們也相信，只要能在印度駐紮大量的軍隊，最終也就意謂著，他們將能夠介入印度政治。²⁵

23 “R. Peel, India Office to P. E. Williams, War Office,” February 1943,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FO 371/35827, TNA.

24 根據曾任中國遠征軍第11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1907-1993）的回憶，在1942年11月，亦即英國同意中國軍隊留在印度後的一個月，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部就派遣密探，以聯絡官的名義作為掩護，常駐雲南大理，美其名是交換日軍在緬甸活動的情報，實則打探中國軍隊的意圖及其與緬甸北部人民的往來情況。不過，為了中英盟邦情誼，宋希濂並未直接點破該密探身分。參見宋希濂，〈遠征軍在滇西的整訓與反攻〉，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40-70。

25 “War Office to the Commander-in-Chief, India,” March 1943,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FO 371/35827, TNA.

誠然，英國內部不乏對中國駐印軍抱持著擔憂態度，認為很有可能對戰後英國在印度、緬甸的統治，構成重大隱患。但是，當時在中、美、英協同對日作戰的大環境下，英國縱使有所忌憚，依然不太可能明目張膽地公然反對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所以對於魏菲爾的疑問，英國陸軍部只能勸其應勉強接受駐印軍編制人數的增加。

事實上，魏菲爾本人也坦承英國不太有立場去拒絕中、美兩國的擴編要求。畢竟，中國駐印軍只是借用印度蘭伽的營地，至於裝備、糧食以及物資都是由美軍負責。現有中國駐印軍的紀律，也完全符合英國標準，並無太多可詬病之處。因此，魏菲爾建議或許可以消極的應付，亦即一方面雖然同意中國駐印軍的擴編，但另外一方面則不願提供額外的援助，包括裝備與物資的運輸等。²⁶

印度總督林利思戈（Victor Alexander John Hope, 1887-1952）同樣亦對中國駐印軍擴編之事，抱持著懷疑的態度。林利思戈自承他比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對此「更加感到不安」，尤其擔心在政治上，會對印度有不好的影響。林利思戈在給印度緬甸事務大臣的電報中，雖然直言他對於中國駐印軍是否要再新增編一個師，並無特別的反對之意，但是強調英國應該對於中國駐印軍的編制規模，設定一個上限，並堅持這個標準，不能一再退讓。至於這個上限為

26 “Inward Telegram,” Viceroy, Siml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25 February 1943,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FO 371/35827, TNA.

何，則應由英國相關部會共同決定之。因此，他請求英國政府，在他正式同意中國駐印軍進行擴編前，應該設定上限標準。²⁷

關於印度總督以及英屬印度軍總司令的政治顧慮，建議中國駐軍印部隊編制規模應制訂上限等問題，英國政府各部會亦進行意見交流。印度緬甸部、陸軍部以及外交部等各部會，大致上均認同印度總督林利思戈的建議，基於政治上的顧慮，確實應該制訂中國駐印軍的上限人數，以防止其一再擴編，從而造成未來印度與緬甸事務的不安。²⁸ 是以，在陸軍部給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的電報中，正式授權其與美國與中國展開交涉，儘管同意此次擴編計畫，但須附加上一條但書，委婉地要求中國駐印軍的編制規模，應以當地可以「適當」容納、「不會引起嚴重不便」的數量為限。²⁹

（二）第二次擴編計畫

1943年5月，史迪威利用訪問倫敦的機會，當面口頭向英國參

27 “Inward Telegram,” Viceroy, Siml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25 February 1943,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FO 371/35827, TNA.

28 “R. Peel, India Office to Lieutenant Colonel P. E. Williams, War Office,” 25 February 1943,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FO 371/35827, TNA; “H. A. F. Rumbold, India Office to Major Elliot, War Office,” 26 February 1943,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FO 371/35827, TNA;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4 March 1943,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FO 371/35827, TNA; “Inward Telegram,”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to Viceroy, Simla, 4 March 1943,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FO 371/35827, TNA.

29 “War Office to the Commander-in-Chief, India,” March 1943, Chinese Troops in India, FO 371/35827, TNA.

謀首長委員會（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 C.O.S.）提出中國駐印軍新一波的擴編計畫，準備將駐印軍人數大幅提高至 10 萬人。史迪威的擴編計畫，一度讓英國軍方以及印度緬甸部相當震驚，急忙籌思因應對策。因為茲事體大，英國空軍部甚至以「最高機密」等級的電文（“Most Secret Cypher Telegram”），通知英國駐華盛的「聯合參謀團」（Joint Staff Mission or later British Defence Staff, Washington），告以英國內部對於此擴編方案的顧忌。³⁰ 不難理解，英國軍方可能是希望能夠透過駐美參謀團，預先籌劃對策，以便因應史迪威後續的要求，同時順便隱含探聽與疏通美國參謀首長們等對於此案的意見與態度。³¹

1943 年 6 月間，史迪威正式向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提交了新的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準備再新增 58,000 人至印度北部，以便作為既有駐紮印度地區 42,000 人的「替換與增援」部隊

30 “Most Secret Cypher Telegram”, Air Ministry, London to Britman, Washington, 3 July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早在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前，1940 夏季起，英、美兩國即在倫敦透過一系列會談，決議強化兩國軍事合作，互派參謀團，以便為美國未來可能的參戰做準備。1941 年 6 月，英國駐美聯合參謀團正式成立，由三軍高階將領主持，直接向英國倫敦的參謀首長委員會負責。其重要任務，即是與美國參謀首長以及政要們保持密切聯繫，同時提供英國駐美大使有關軍事與戰略方面的諮詢，維護大英帝國的利益。關於英國駐美聯合參謀團，詳見英國內閣檔案（Records of the Cabinet Office, War Cabinet and Cabinet Office: British Joint Staff Mission and British Joint Services Mission: Washington Office Records, CAB 122）的相關介紹。

31 不過有趣的是，英國駐美聯合參謀團在給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的電報中，卻表示美國參謀首長們並未提出所謂的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因此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決議暫時按兵不動，以待史迪威的後續行動。參見“Extract from C.O.S (43) 150th Meeting (O),” 8 July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replacements or/and reinforcements”）。史迪威提供的理由是：目前不太可能在雲南當地，直接進行中國軍隊的軍備換裝與彈藥補給，此乃因受到從印度阿薩密（Assam）前往中國空運路線的限制，無法在短時間進行軍備空運，故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盡可能地將中國軍隊運往印度，以便就近在當地進行組訓、換裝與彈藥補給。³²

表2：中國駐印軍現況報告（1943年6月）³³
（英屬印度軍總司令給陸軍部的報告）

駐地	印度蘭伽 (Ramgarh)	雷多 (Ledo) ³³	運輸中	後續增援 (擴編計畫)
兵員(人數)	23,700	10,664	10,000	58,000

然而，史迪威的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在現實技術條件上，有許多的難題必須克服。首先，在營舍部分，就有不小的難度。如依照史迪威的要求，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評估，可能會在1943年8月至12月的時間，將會有高達58,000名中國士兵運往印度。其中35,000人，預計在9月時會進駐在蘭伽地區既有的營舍。但因為蘭伽營舍不足，故還須緊急興建新營舍，且必須在12月底前完工，方能容納額外的20,000至25,000人。在淡水供應上，同樣也有棘手之處。蘭伽地區的水資源，雖然在一般情況下，應該可以供應上

32 “Commander-in-Chief, India to the War Office,” 10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Deputy Commander-in-Chief, India to Viceroy, Simla.” Cited from “Viceroy, Siml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13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33 “Commander-in-Chief, India to the War Office,” 10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Deputy Commander-in-Chief, India to Viceroy, Simla.” Cited from “Viceroy, Siml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13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述部隊所需。但是在 3 月至 6 月間的乾季時，水資源可能只能供應 30,000 至 40,000 人所需，因此將會出現缺水的問題。解決之道，乃是在雨季時，預先儲存足夠水量。如此，則有必要另外興建新的水利設施，如水庫與儲存槽等。但是這需由工程師等相關人員，重新規劃水資源儲存與分配方案，以看是否能夠滿足所需。³⁴

事實上，根據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給陸軍部的「最高機密」報告，最為棘手之處，還是屬於軍用物資的調度問題。以當時印度既有的運輸條件來說，勢必無法達成所有部隊的物資供應需求。因為以阿薩密東北部地區現有的運輸系統來說，每月總運輸能力，充其量不會超過 1 萬噸。而這近 1 萬噸物資量，不但需支援中國戰場，還要供應既有的中國駐印軍，以及駐紮英帕爾的英軍部隊。如果再新增 58,000 名的中國士兵，預估每月所需要的物資，可能會提高到三倍，亦即每月須再額外增加近 2 萬噸的物資量（尚不包括所需要的油料補給）。³⁵

34 “Commander-in-Chief, India to the War Office,” 10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Deputy Commander-in-Chief, India to Viceroy, Simla.” Cited from “Viceroy, Siml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13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35 “Commander-in-Chief, India to the War Office,” 10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根據英屬印度軍總司令給陸軍部的另外一份最高機密報告，美國對於中國的空運補給運量，大約可達到每月 10000 噸。目前則在積極發展另外一條途經波斯地區的航線（Persian Route），預計可達到每月 1700 噸，不過遭到俄國的反對，因為俄國不准貨物運輸途經其境內。參見 “Commander-in-Chief, India to the War Office,” 18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史迪威的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不但涉及到營舍供給、水資源儲存等諸多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還可能會嚴重影響到既有運補系統的調度，甚至導致其他部隊軍用物資的供應不足。

因此，在印度總督林利思戈給英國印度緬甸部部長的內部電文，亦表示其個人的對於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的「嚴重不安」（“grave misgiving”）。他抱怨當初英國政府先前因考量到維持中、美兩國戰時盟邦友誼之故，不得不同意中國駐印軍的先前擴編（應是指 1942 年 10 月至 1943 年 2 月間，英國政府同意中國駐印軍人數由原先的 2 萬人，提高至 3 萬多人，再提高至 4 萬多人），但自此破例後，中、美兩國難免得寸進尺，故而進一步要求將駐印軍部隊人數提高至 10 萬人。事實上，對印度本身而言，中國駐印軍一再擴編，將造成很大的麻煩，特別是如此大量規模的部隊，很明顯地會造成印度行政上的諸多不便。雖然林利思戈最終並未明言表態反對，並強調他可以理解英國政府可能有許著多其他顧忌，因此無法驟下決定，但還是希望英國政府能夠再三斟酌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的可行性。³⁶

正當英國政府內部正為是否該接受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維繫戰時外交邦誼與確保印度緬甸政治利益之間的度量，以及如果決定要拒絕，又該以何種理由，方能顯得義正辭嚴等諸多問題焦頭爛額

36 “Inward Telegram,” Viceroy, Siml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13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之際，1943年7月底，史迪威忽然通知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擬將擴編的軍隊數量，從原先的58,000人，大幅降低為15,000人。是以，中國駐印軍總人數將僅提高至57,000人，而非本來規劃的10萬人。無論史迪威後來決定調降擴編人數的動機為何，或許是考量到當地的軍事營舍與物資供需的限制，又或者事先帶有精於算計的預謀，亦即先提出過於誇張的數字，之後再配合地讓步調低，間接使英國不好再提出婉拒。然而，無論如何，史迪威一再擴編駐印軍的計畫，依然還是得逞。事實上，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在收到史迪威調降擴增方案後，坦承他們原先想要從軍事視角來拒絕的理由，確實因為後來的調降，而無法再站得住腳。大英帝國總參謀長暨參謀首長委員會主席布魯克（Alan F. Brooke, 1883-1963）即清楚表態，由於史迪威主動調降數字，英國此時已不太可能再以軍事上的理由，來拒絕擴編的要求，因此他傾向準備接受削減過後的中國駐印軍擴編方案。因此，參謀首長委員會也決定在獲得印度緬甸部的同意後，正式接受史迪威的要求。³⁷

簡言之，在史迪威有限度的妥協，又或者更可能是早就安排好的算計下，中國駐印軍再次的擴編方案，依然順利得逞。英國雖然不樂見中國駐印軍的持續擴編，但在顧全中、美、英聯合對日作戰的大前提下，英國最終也只能無奈地選擇接受。但從上述過程中，

37 “Extract from C.O.S. (43), 175 Meeting (O),” 29 July 1947,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可以進一步分析與探究其體現的重要意涵與時代意義。尤其是在美國的壓力下（主要來自史迪威），英國面臨維護帝國利益與鞏固外部邦誼兩者之間，該如何取捨與折衷？中國駐印軍對於英國來說，到底是助力還是阻力？英國能否與中國摒除成見通力合作，還是該謹慎懷疑，以防中國別有動機？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重，從英國政府內部對於中國駐印軍問題的意見交流與駁難，可以體現其戰略思維。

（三）英國眼中的中國駐印軍問題

中國駐印軍的存在，對於英國來說，乃是一種兩難的局面。受限英軍本身有限的戰力，英國當然希望中國軍隊在美國的訓練與裝備下，能夠替兵力不足的英國反攻緬甸。然而，從英國在印度與緬甸的政治利益方向思考，中國駐印軍的擴編與強大，可能帶來另外一種隱憂，亦即中國及其背後的美國，可能隨著反攻戰事進展，逐漸強化對印度與緬甸事務的干涉能力，從而影響到未來或是戰後英國在亞洲的布局。因此，印度緬甸大臣艾默里在政治上的諸多顧慮，確實有其立論依據。可是中、美、英三國協力作戰，儘速擊敗日本，畢竟是當時英國在印、緬地區最重要的戰略考量，如果僅是因為政治顧慮，而影響到調戰略部署，甚至導致反攻緬甸的挫敗，那就不償失了，也會因此引起中、美兩國的極大不滿，破壞戰時盟邦間

的情誼。事實上，在外交部諸多官員的內部討論中，有一些意見，確實可以清楚體現英國內部對於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的權衡與取捨。

不論贊成或反對（史迪威的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都有其政治上的考量。但是對於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來說，最好是同時兼顧兩種意見，或是僅嚴格侷限在軍事技術上的考量。假如，戰時內閣基於全球戰略佈局的整體考量，決定以軍事理由為藉口，拒絕中國駐印軍的擴編，那應該要當機立斷。不過，重要的是，拒絕美國人（包括中國人，因為要派來的是中國軍隊）的理由，只能是軍事上的考量，而不能提及政治上的。³⁸

換言之，英國如果為了自身在印度與緬甸的政治利益，而拒絕了史迪威的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那就不能夠留下絲毫的口實，只能將所有原因，歸咎於水源物資調配、營舍供給、軍隊運送等軍事技術方面的困難，否則後續的負面衝擊，恐將相當巨大。因此，基於上述考量，英國外交部官員主張應該要從外交的層面，向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清楚表達外交部對於中國駐印軍擴編案的態度，強調即使出於印度緬甸部諸多政治上的顧慮，外交部依然傾向於接

38 此則備忘錄意見，乃是由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官員克拉克（Ashley Clarke）提出的。參見“Chinese Troops for India,” Minutes of Ashley Clarke, Foreign Office, 26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受史迪威的擴編計畫，畢竟從軍事的視角來說，中國駐印軍的存在，本就在於其軍事上的作用。如果駐印軍無法在未來的反攻作戰中扮演重要的地位，英國不可能僅基於外交上的顧慮，就同意該軍繼續存在於印度。

其次，從英國內部相關的檔案分析，史迪威大幅擴編中國駐印軍的計畫，可能有兩點值得進一步探究。其一，史迪威並未事先透過常規管道，由美國參謀首長會議正式向英國駐美「聯合參謀團」提出，反而是由其本人先在倫敦利用與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晤談場合口頭示意，之後再直接向英屬印度軍總司令提出要求。³⁹ 其二，根據英國外交部與軍方所掌握的消息，史迪威的擴編計畫，似乎亦未事先告知中緬印戰區總司令蔣中正。

⁴⁰ 換言之，英國內部認定此番中國駐印軍大幅擴編一事，恐非美

39 英國參謀首長委員會原先曾透過駐美「聯合參謀團」，想要從美國參謀首長委員會打探相關情報，但當獲悉美國方面尚未就中國駐印軍擴編計畫提出正式要求後，隨即決定接受駐美「聯合參謀團」的建議，不再為此做任何接觸動作。參見“Extract from C.O.S (43) 150th Meeting (O),” 8 July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40 英屬印度軍副總司令曾透過史迪威派駐在印度新德里的後方梯隊幕僚長法里斯 (Benjamin G. Ferris) 間的聯繫，獲悉史迪威本人應尚未與中緬印戰區總司令部商討此事。參見“Deputy Commander-in-Chief, India to Viceroy, Simla.” Cited from “Viceroy, Siml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13 June 194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FO 371/35740, TNA. 關於法里斯的職位，及其在中緬印戰區的角色，可參見 Charles F. Romanus & Riley Sunderland,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Army, Defense Department, 1956), Vol. II, pp. 43, 124, 325, 366-367.

國軍方高層，或是中國最高領導當局主動授意，部分可能乃是史迪威個人意志的推動。但即使如此，英國政府最後寧願選擇勉強接受史迪威後來刪減版的擴軍計畫，也沒有進一步與美國參謀首長委員會或是蔣中正本人做確認或交涉斡旋的打算。這也意謂著英國並不打算在中國駐印軍問題上與史迪威交惡。這或許也意謂著，在某種程度上，英國眼中的中國駐印軍問題，並非只是中英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英國與美國之間的問題。英國固然可以猜忌中國的圖謀，但如果因為如此而得罪美國，則不見得划算。

簡單來說，從英國的角度而言，所謂的中國駐印軍問題，固然表面上涉及到對中國的猜忌與不安，但其實核心成分，很大的比例，可能還是英國與美國之間的互動與角力。

結語

關於中國遠征軍的出現，中國方面的相關回憶與資料，往往將其歸諸於 1941 年底的《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但是遍查英國外交部的相關檔案，均無發現有此協定。這或許跟中、英雙方對於中國軍隊入緬作戰一事的不同理解而造成。不過，另一方面，如果從英國軍方與外交部門的檔案，去研究中國遠征軍，倒是可以對其有更為清楚的瞭解。原來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蔣中正即曾對英國

提議願意出兵協防緬甸，但當時英國因顧忌日本態度，始終並未認真思考此議。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歐洲與亞洲戰場合一，中、美、英等開始籌劃協同作戰，這也使得中國入緬作戰一事再度成為重要議題。在蔣中正倡議諸國共商軍事同盟大計，以及英國面對日軍在遠東戰場的咄咄進逼，確實也需要中國軍隊協防緬甸等兩大前提要素的刺激下，英國軍方授意英屬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專程來華，出席重慶的軍事聯席會議，直接與蔣中正面商中英軍事合作之事。也是在此次會議上，中、美、英等盟邦將領最終敲定了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計畫。不過，從英國檔案來看，英國政府並沒有把此事提高到兩國外交上的正式「協定」層次，相反地，在英國軍方與外交官員眼中，此事或許充其量只是共同商妥的一次秘密軍事作戰計畫罷了。後來隨著緬甸作戰失利，盟邦間又陷入相互指責，中國遠征軍議題更是成為中、英齟齬與彼此卸責的重要談資。

另外一方面，從英國的檔案資料來看，中國駐印軍從組成之初，到後來的陸續擴編，最主要的靈魂人物莫過於史迪威。因為他向英國政府的一再爭取，中國駐印軍方能獲得充分給養與訓練裝備，持續成長茁壯，最終在反攻緬甸作戰上，發揮關鍵作用。在他的爭取下，中國駐印軍從原先的 1 軍 2 師（主要是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失敗後，撤往印度的新 38 師、新 22 師，及其共同編組成的新 1 軍），後來陸續透過空運增補兵力，擴編成了 2 軍 5 師（新 1 軍轄新 38 師、

新 30 師、新 50 師，新編第 6 軍轄新 22 師、新 14 師）。⁴¹ 以往史學界對於中國駐印軍的理解，往往受到史迪威本身高度爭議性的影響，較為側重在中、美關係，以及蔣中正與史迪威之間指揮權的爭奪。但是卻忽略了另外一個重要的面向：若非史迪威幕後的籌劃張羅，以及其持續向英國與印度政府施壓交涉，中國駐印軍能否成立，成立後能否獲得足夠的物資、裝備與訓練，以及能否持續擴編，最終構成強大的戰力等，均會有很大的疑問。而從英國的檔案與視角，來看中國駐印軍問題，就會發現史迪威確實扮演極其關鍵的角色，構成英國方面很大的壓力，逼迫英國不得不接受中國駐印軍及其一再擴編壯大的事實，縱使英國本身非常不樂見上述情況的出現。

事實上，早在 1942 年新 38 師撤到印度之初，英國與印度政府即對中國軍隊進入印度之事，抱持很大的猜忌，懷疑該部隊可能與印度人民合作，甚至不顧中英軍事同盟，強悍要求新 38 師繳械，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曾任該師砲兵營營長的王及人即回憶，當時一度情況緊張，全師甚至下達「加強戒備，準備戰鬥的命令」。所幸後來風波平息，英國方始同意中國軍隊暫留印度。王及人在回憶中，認為是孫立人居中斡旋發揮重要作用，免除該師覆沒的命運。⁴² 但顯

41 關於中國駐印軍擴編後的編制，參見鄭洞國，〈中國駐印軍始末〉，頁 71-84

42 王及人，〈從印度整訓到反攻告捷〉，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年），頁 321-329。

而易見的，孫立人與英國並無多大淵源，其主要的關係，還是在美軍方面，也只有美軍出面斡旋擔保，才能使得英國退讓。而當時能夠讓英國不得不退讓的關鍵，自然就是美軍指揮官史迪威。⁴³

尤有要者，英國眼中的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問題，或許是側寫戰時中英關係的一副照妖鏡。從英國請求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到對中國駐印軍一再擴編的疑慮以及反覆盤算，可以清楚看出英國對於中國的複雜情緒。但要深入探究英國對於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的反應，應該還須回歸到戰時中英關係的大脈絡中，去理解當時英國是如何看待中國這個盟邦？在擊敗日本與維護帝國利益之間，當發生抵觸之時，優先順序為何？

回顧歷史，自五四學生運動喊出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以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響徹雲霄的口號「打到列強、除軍閥」，在在訴說著想要改正不平等條約，並試圖挑戰其背後的列強。對於中國來說，英國不但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更是與帶領列強在華建立的條約特權體制的重要推手。因此，中國的復興與崛起之路，絕對少不了與英國的周旋。不僅僅是牽涉到調整中國與列強之間的不

43 齊錫生認為緬甸作戰的勝利，乃是眾人之功，包括國民政府與中國軍隊的貢獻，但是一部分功勞也應該歸功於史迪威極其麾下的美軍官兵，特別是「美國軍方在印度蘭迦訓練基地的成就，有目共睹，的確可圈可點。」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修訂版），頁390。

平等條約特權問題，還包括未來如何界定中國與西南周邊地區，諸如緬甸、印度、西藏等的關係，這些均與英國在遠東地區的核心利益密切相關。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的存在，恰巧刺戳到英國人心中的敏感神經：以前被英國人踩在腳底下的中國人，但現在英國卻需要中國軍隊的協助，才能擊敗日本。同時，隨著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以及駐印軍在印度、緬甸展開的反攻作戰，中國在當地的威望與影響力也可能與日俱增，中國也可以利用此優勢，挑戰英國在這些地區的殖民統治地區。然而更加諷刺的是，在過去，這些地區有部分正是英國從中國手中爭奪而來的。英國最大的矛盾是，只有強大的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才能確保印度安全並反攻緬甸，但愈加強大的中國軍隊，卻反而可能讓英國失去對於緬甸，甚至印度的控制權。換言之，上述反差心態，以及極度害怕失去既有的利益，使得英國在看待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問題時，難免出現進退失據、自我抵觸的困境。特別在那些職司在維護英國殖民利益的官員眼中，強調對於中國軍隊在印緬地區的存在，必須始終保持小心戒慎的思維模式，防微杜漸，否則縱使未來擊敗日本，英國恐仍將失去其在遠東地區的宰制地位。

究其實際，中國或許確實對於戰後東亞秩序的重建，包括民族自決與殖民地獨立問題，有自己的盤算。⁴⁴但是在 1943 年戰事緊張，

44 蔣中正在 1943 年 6 月的日記中，確實已開始思考在中、美、英、俄四國會議（此即後來的開羅會議）上，準備提出包括「東亞民族解放」以及「英國殖民地」處理等問題。這些議題自然會影響

反攻緬甸軍事行動在即的時刻，英國指控中國可能已經開始盤算如何利用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來強化中國在印度與緬甸的優勢地位，可能又太過庸人自擾，有些未雨綢繆了。⁴⁵ 事實上，正好相反地，蔣中正早在 1942 年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失利後，即堅持「雲南防務第一主義，反攻緬甸為次要問題」；⁴⁶ 有時甚至認為是被「英美慫恿」，才參與緬甸作戰，間接導致中國戰場的失利。⁴⁷ 換言之，當英國質疑中國可能藉由中國駐印軍與反攻緬甸行動，來強化在印度與緬甸的利益，中國本身可能也不想涉入過深，如果不是關係到中國戰場與確保印度、緬甸補給路線等問題。

⁴⁸ 畢竟，對當時的中國而言，如何維護中國戰場的穩定，乃是第一優先，遑論想要藉由軍事行動，來介入南亞與東南亞事務。一言以蔽之，在主觀意識上，中國可能想要參與戰後東亞國際秩序的重建與規劃，但在客觀條件上，以 1943 年的戰況而論，中國不太可能

到英國在印度、緬甸的利益。參見「蔣中正日記」，1943 年 6 月 23 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45 從 1943 年蔣中正日記來看，他雖然偶有提及到殖民地與民族解放等問題，但並未將之與中國駐印軍掛上關連。

46 「蔣中正日記」，1942 年 11 月 12 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47 蔣中正即曾抱怨當初「被美、英之聳躄〔慫恿〕，出兵緬甸，以致（中國本身戰事）一蹶不振者至今也。」參見「蔣中正日記」，1943 年 6 月 3 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48 1942 年 6 月，印度領袖甘地（Mohandas K. Gandhi, 1869-1948）曾致函蔣中正，表態支持中國抗戰，但希望與中國合作，促使英國退出印度。但蔣中正卻認為「此種革命策略與態度，殊為錯誤」，且感到棘手，「頗難措辭，故不願其公布來書也。」在該星期反省錄中，蔣中正又再次強調甘地「希望中、美干預英、印問題，此不可能之事」，參見「蔣中正日記」，1942 年 6 月 18 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中正日記」，1942 年 6 月 20 日，上星期反省錄，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有實力或有意圖，想要透過中國駐印軍，將之付諸實現。⁴⁹究其實際，對於中國，反攻緬甸的主要目的，終究還是基於中國戰場的整體考量，而非為了介入東南亞事務。⁵⁰

49 事實上，可能因為擔心英國懷疑中國對於緬甸別有用心，蔣中正還特別同意英國駐華大使之請，在反攻緬甸時，准許英國派員與中國軍隊同行。參見「蔣中正日記」，1943年5月5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50 蔣中正在日記中，即稱「如果滇緬公路被我打通，則黃河以南倭軍，必將退守華北，故對緬反攻應全力赴之，多抽國內主力增強滇緬兵力，是為必要，減少長江以南地區兵力無妨也。」由此可以看出，在蔣中正心中，無論是滇緬公路的打通，還是反攻緬甸的軍事行動，均是為了切斷與牽制日軍在中國戰場的優勢地位。參見「蔣中正日記」，1943年4月25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 80 週年座談會 論文集

作 者：馬英九、劉偉民、周惠民、張鑄勳、劉維開、楊維真
王懷慶、應俊豪

編 者：財團法人馬英九文教基金會

文字編輯：洪于茜

美術設計：林宥萱

董 事 長：馬英九

出 版 者：財團法人馬英九文教基金會

電 話：02-27937008

傳 真：02-27937008

信 箱：myj19service@gmail.com

印 刷：飛燕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22 年 7 月

定 價：新臺幣 300 元

ISBN 978-986-99860-3-8



9 789869 986038

00300

